

旧金山湾区革命联盟

红色文件 3：争取妇女解放

红色文献翻译

3-1：解放斗争中的女性，概述

（本文来自玛丽·洛乌·格林伯格在 1970 年三月八日为旧金山的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做的一次演讲，她本人是湾区革联成员。）

约 140 年前，在奈特·特纳的领导下，黑人奴隶们发动了反抗弗吉尼亚奴隶主与庄园主的大起义。紧接其后，马萨诸塞州洛威尔的纺织女工们决定一起罢工，反对十三小时工作制和低于 1.25 美元的周薪。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美国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开始逐渐发挥其重要作用。

例如，自十五岁起便开始反抗奴隶制的哈丽特·塔布曼。当时，她的主人令她去捆回一名逃跑的奴隶并给予鞭打；她没有听命，反而帮助这名奴隶逃跑。从那时起，她先后帮助了三百多位同胞重获自由。在她二十九岁时，她自己也成功逃跑了。她帮助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重获自由的行动是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奴隶主们通缉她的赏金都有四万余元。一把左轮手枪，是她当时用来保护“乘客”的唯一武器。后来，她被人引荐给约翰·布朗，参与筹备了解放南方奴隶的计划。

大约与此同时，玛丽·哈里丝·琼斯也在帮助美国各地的工人计划并组织罢工，以便摆脱疲于奔命而一无所有的窘境。人们因此称她为“琼斯老妈”。她主要的帮助对象是煤矿工人，协助他们策划并赢得罢工。有一次，她让男性工人们都待在家里，然后带领着一大群女人，拿着拖把、扫帚、石块或者任何趁手的工具，把工贼们赶出了矿区。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纪念国际妇女节，纪念这个起源于黑人奴隶起义，传承着洛威尔纺织女工、哈丽特·塔布曼、玛丽·琼斯等精神的光荣节日。今天，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黑豹党的女性成员们蹲了监狱；在米申，土生土长的本地拉丁裔女性正尝试与李维·斯特劳斯的血汗工厂进行斗争进而声援“洛城七君子”；在下周，医院的职工们将开展罢工；在高校，女性职工们则试图将教育从统治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转而为工人

阶级服务——这些正是美国女性的斗争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鼓舞与激励。

所有的斗争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表示我们参与的不同斗争都是同一场斗争——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同的组成部分。但，到底是为了“解放”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与争取提高救济的斗争不同。”活动章程里提到了一位来自“女性解放运动”的发言人，但实际上所有的发言者，不限于所谓这个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正如哈丽特·塔布曼、玛丽·琼斯等人一样。

以玛丽·琼斯为例。她本人在女性权利上其实非常保守。她认为，女性不应该外出工作，而应该呆在家里抚养孩子。她也没有到处宣传“男女同工”。她知道女性曾经被招为矿工，当时的女工必须裸露上身，才能在狭窄的坑道里用四肢爬行将一车车的煤拖出来。她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宣传“男女同工”只会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一起平等的死在矿井里。有一天，她在一场富人阶级的“女性参政论”会议上语惊四座——没有选票也可以改变现状，只要像她自己一样，秉持刻骨的憎恶来坚持声讨社会的不公。她觉得政治只不过是老板们的游戏，与其随之起舞，不如先争取经济公平。琼斯老妈为女性解放而做的贡献，可能不少于任何“女性参政论者”或“女权主义者”。她教导矿工的妻子们站出来为家人高呼并抗争，而煤矿工人们也因此尊敬她超过任何男人。

当然，今日不同往日，女性可以作为女性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但在更大范围内，工人和失业者的处境仍然艰难。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辞退，很多人不得不靠救济维生。女性，尤其是非白人女性受此影响最深。

什么是“女性的解放”？

今天这里所有的发言人都在谈论女性，都在说女性应该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整个工人阶级的自由而斗争。那么，我们所说的“女性解放”到底是什么？

曾有人认为，女性的解放只是个人的解放或者免于约束，并被进一步解读成：免于内衣的约束，找一处公社定居，选择不止一位男性当伴侣，

由此一个女人可以获得“自由”。这种主张的潜台词是：甚至可以不用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你就能获得自由。

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种“个性化的自由”，只有富人买的起。而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男女，受困于形似奴隶社会的当代美国，这种方案只能是空想。只有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级管理工业，运作政府，服务人民，才能为女性，以及男性，提供获得自由的可行方案。

因此，女性解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各方面男女平等的社会。在工厂，在社区，在家里亦或在学校中，女性与男性都能平等的开展工作，而无需什么大老板来指手画脚。我们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而无须听命于脑满肠肥的统治者。

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温暖而又友善的托儿所里得到照顾，顶级的医疗机构则对所有人开放。而现在，生得起病的只有富人！例如，可以得到堕胎或者孕期服务的绝大多数是富裕的女性。被强制使用生育控制措施所绝育的只有贫穷的女性，理由不过是：“孩子太多所以穷”。但实际上呢，贫困的原因只不过是食物和物资被资本家们囤积居奇，仅此而已！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校里会讲授真实的历史，即包括女性以及各种肤色和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历史。那里不会也不需要失业保险或救济金，因为人人都会有工作，更不会因为缺衣少食而生活困窘。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生病或者更换职业时，我们的工人政府会确保家庭生活的无忧，鳏、寡、孤、独、废疾者更不会被弃之不顾。所有的这些帮助，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像当代这样有辱劳动者人格尊严的国家体系，通过克扣你所拥有的从而使你感到活得像个乞丐，更不会拿永远找不到的工作当鱼饵和抛弃你的借口！

在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里，女性可以在是否生育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决定，也不用担心被迫承担不想要的婚姻。我们不需要维持性感、蠢萌或者无助的形象，更不需把妻子和母亲当作唯一的“职业”。相反，无论男女，都会有平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以自己的贡献和成就而感到自豪。

社会主义下的女性

例如，1946年胡志明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越南女性几乎没有政治权利，而在法国殖民者被赶走后，女性马上获得了选举权。今天的北

越，女性实现了同工同酬，与男性一起在工厂和田间劳动，或者共同保卫祖国。婚后的女性仍然可以使用自己的姓名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必须遵从夫姓。而丈夫则与妻子分摊照顾孩子的工作，女性因而也就有了平等的机会来接受教育或者参与集会。

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处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从之前的封建农奴制变成了能顶半边天。现在，中国女性可以担任村官或生产队队长，更可以在社会各层中担任领导职务。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上天所赐予的。人们过去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未来也将继续努力下去。相对的，男性农民和工人则对于女性改变千百年来从属地位心有不甘。但是，通过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其中女性的工作，他们开始意识到女性的全面参与有助于全体劳动者对抗地主和统治阶级的事业。

作为对比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女性工人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可能只能拿到六成的工资。大公司的所有者们希望我们当全职主妇，因为待在家里才能更好的照顾这一代工人和养育下一代工人。大老板们利用种族主义在白人和其他工人中间制造矛盾，同样地，也利用男性至上的思想来在男女工人、丈夫妻子中间制造隔阂。那么，当经过一天劳作身心疲惫的丈夫回到家中，将怒气发泄在妻子身上的时候，是谁在受益呢？当工会官僚们放弃男女同工同酬的主张，于是女性工人回家对着男人抱怨的时候，又是谁在受益？每次都是大老板们！

谁才是敌人？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获得女性的解放，我们需要先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非宽泛的男性，是工厂的大老板，大公司的所有者，是为这些人撑腰的政治家们，也是保护他们利益的警察和军队。这些人也是越南人民的敌人。他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决定了学校怎样教育下一代，决定了我们工资有多低，决定了会施舍出多少残羹冷饭聊作社保，也决定了警察们把枪口指向哪里。

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将所有的女性、男性、工人、学生、以及仅靠社保度日的人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个统一战线将由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尤其是目前已经在领导国内斗争的深色皮肤的工人。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人，工

业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关闭当前的国家机器，接管各地工厂，然后为了劳动者的利益来重新开始运转它们。在这些工人中，最有勇气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最有远见的一部分，以及他/她们的盟友，将会组成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政党将会回应我们的要求，带领我们打败大老板们，建立社会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将会这样建立：

通过支持全国范围内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解放活动，以及所有被压迫的少数族裔的民主化需求；通过支持国外被压迫人民，目前主要是由越南地区的人民带头开展的解放斗争；与国内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式的镇压[1]做斗争。

这个统一战线会为了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女性而斗争，也会与尼克松政府为应付通胀而默许的、日益增多的裁员、加班、涨价、提税和降低社保等政策而斗争。

统一战线中的女性

在反抗针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以及统一战线的其他方面，女性应当争取发挥领导作用。具体的斗争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以提升个人素养为目标的女性互助小组，工会里推进无歧视主张吸收会员的运动，以及工人团结委员会等等，均可用来与各种形式的职业歧视进行斗争。通过社保权利组织和租户联合会等组织，为大家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权利守住底线；为惠及所有劳动者的医疗保障的权利（包括女性拥有不被强制怀孕的权利）做斗争；通过女性互助小组来了解我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及其社会根源等等。一直以来，我们被规训灌输：看重个人竞争力而轻视基于信任的合作，这样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然而只有在基于劳动者的合作、由广大工人来共同运行的社会里，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当下这种备受压迫状态。而即便在这样的社会里，也需要很长时间来摆脱当代统治阶级灌输的虚构概念，即“白人优于非白人，男性优于女性”。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与这些概念做斗争来进而改善两性关系。

为了工人阶级能真正的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帮助女性成为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的人。我们不应当对“女性只能当家庭主妇”的观点妥协。具体而言，当我们学习黑豹党，建立托儿所和为孩子提供早餐的项目时，男性也应该一起来当厨师和亲手照顾孩子。我们应当鼓励夫妻分担家务，尤其

是当妻子也有正式工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主张的“女性权利”并不是靠虐待男性来实现的，相反，平等相待可以带来更好的两性关系，这应当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革命者或者社会变革的支持者，应当身体力行的实践男女平等的思想，而男性的革命者则有额外的责任来让自己的工友和同事们逐渐接受这一思想。

女性平等的主张也意味着女性应当参与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装斗争。我们知道，大老板们不会束手就擒。我们只有在所有层面上不分男女地集合起尽可能多的力量，才有可能获得胜利！只有当所有人都团结在积极改变社会的工人阶级周围，这样的统一战线才有了彻底击败我们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只有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我们，作为女性，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

注：：

[1]这些活动通常是在法庭支持下，由警察执行，其针对的对象包括：黑豹党，洛城七君子，在各地组织罢工的男女工友，以及所有主动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例如芝加哥八人的反战抗议活动。我们应当帮助这些首当其冲的人，同时也应谨记还会有更多“密谋”审判。

3-2：妇女和家庭

全国各地的妇女正在觉醒，妇女小组加入到工会组织中，要求同工同酬和平等就业的机会。女学生聚在一起形成了妇女解放组织，家庭主妇组织起来要求为她们孩子建立托儿中心。罢工者的妻子正同她们的丈夫站在同一游行的队伍中。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妇女同我们的兄弟们一起游行，抗议如数百名黑豹党党员遭到谋杀和入狱等对革命者的袭击事件。

妇女所说的我们的“地方”不再局限于“家”

男女之间原有分工——妇女生育孩子的生物学事实——不会改变，但我们仍然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

妇女在这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受到男权的压迫——在工作，学校和公共场所普遍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大男子主义——即根植于这种歧视的态度。但不是所有妇女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压迫，例如白人统治阶级妇女与工人阶级妇女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现在杰基·肯尼迪·奥纳西斯身边雇佣的管家跟女仆一样多。纳尔逊·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哈普拥有半个委内瑞拉的土地，在他们享受其收益时委内瑞拉人民正在挨饿。哈普并不是为那些在那里挨饿的女性哭泣，而是为男性哭泣。

这种压迫存在多种形式，来自工人家庭的玛丽莲梦露在好莱坞成名，因为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而自杀，她被作为性感符号出售，但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永不过时的、没有皱纹的、愚蠢的金发女郎，而不因此发疯。

统治阶级的形象

现代流行杂志——《生活》，《瞭望》，《时代周刊》和日报已经开始关注“女性解放”，就像他们已经接受“革命”并用其来包装营销产品赚取利润那样。现代女性可以购买时尚广告中“解放女性”所穿的衣服，可实际上，时装模特是所有女性中最受压迫的女性之一——被时尚形象所束缚。

垄断利润的人也是制造欺骗的人能把任何东西转化为资本利润——除非它真的有助于工人摆脱老板的控制。

夏洛特·福特·尼克科斯，亨利福特生活奢靡的女儿，可以扔掉她的胸罩，用从福特工厂每个工人口袋里赚来的钱购买最新的“解放”时装，去参加“解放”的鸡尾酒会（我梦见穿着透明衬衫参加鸡尾酒会）。在1970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湾区举行了两个集会。第二天，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了伯克利集会上的一位民谣歌手“在小调中不断重复‘我们不需要男人……除了偶尔’。”纪事报没有向读者报道海湾对面的教会区旧金山黑豹党妇女、Los Siete（当地拉丁裔组织）妇女、亚裔联合妇女和女高中生、工薪阶级白人妇女、医院工作的妇女们说：我们联合起来，妇女解放是所有劳动人民解放的一部分。

如果报纸、杂志上的故事和广告可以使妇女运动显得很愚蠢，显得反对男女工人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男女都不会想要了解妇女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许多人而言，“妇女解放”这个词指女性反对男性的运动。许多女性听到“妇女解放”时会提到她们听说的女性虐待她们丈夫的例子，她们说不论怎样也不应该如此对待男人。一些人担心，如果妇女被“解放”，那么女

性和男性的区别就消失了。其他女性好像喜欢关于妇女解放的错误观念，因为它给这些女性提供了更多用来维持与丈夫争斗的弹药。

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实践证明妇女解放对劳动人民的利益至关重要，那么男性和女性都将继续受到男权沙文主义和男权至上主义的影响：男女互相争斗，女工抢夺男工的饭碗，男人殴打女人，丈夫和妻子互相欺骗。两性矛盾将继续阻碍劳动人民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

生活的真相

既然福特的女继承人坐着私人喷气机，那么一个福特汽车工人的妻子适合在待在图景中的什么位置呢？福特和其它所有公司的拥有者都通过她和她丈夫的工作获利。家庭主妇的工作——无论她是否在家庭之外工作——承担养育下一代的福特工人和通过烹饪，洗涤，打扫维持现有劳动力。没有她们做这些事情，资本家将难以保持稳定的劳动力，也无法放心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力供给。

如果她不需要为了维持开支而工作，那么家庭主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家里照看 3 或 4 个孩子和打扫小公寓、小出租屋或者他们从银行租的小房子上。（房契说他们拥有房子，但在 20 年或更长时间内银行真正拥有它，直到房贷被全部还清为止。如果他们没有还上月付，谁得到房子？银行还是家庭？）对于富人或中产阶级，婚姻为妻子提供经济保障，确保她的财产权。但对于这个国家里与普通工人结婚的女性来说，婚姻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经济保障，因为她的丈夫一无所有。

据说工人有足够的收入维持一个家庭，但他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许多男人每周工作 50-60 小时，只是为了维持收支平衡。如果他们的妻子也工作，为了生存一个家庭可能每周要进行 80-100 小时的工作。

工人通常会轮班次工作，起码可以说那会带来“不便”。妻子必须围绕这些计划她的生活。当她的丈夫白天想睡觉，而孩子们正在玩闹时，她很紧张——被他训斥，或训斥他们。当他没有睡觉时，他可能变得紧张，因为他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和糟糕的工作——糟糕不是因为它沉闷乏味（虽然也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在美国制造产品并不令人满意。他非常清楚，他正在制造的产品——比如一辆汽车——在设计上注定会在短时间内损坏。

与社会隔绝

妇女在家中的工作是完全以家庭为中心的。除非她有外出工作，不然她就几乎完全与其他成年人隔绝，一遍又一遍做着重复的劳动。如果她丈夫长时间工作，她也几乎看不到他。她从事的家务劳动使她无法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联系。因此，当她的丈夫疲惫和发怒的时候，当孩子又哭又闹的时候，似乎她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除了家庭她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看起来她没有离开他们生活的理由。如果她不开心，那一定是因为她没有辜负那个理想的妻子和母亲的形象，她“应当”：对孩子们有耐心，对丈夫性感而热情，对访客从容而迷人。

在孩子们上学之前，她每时每刻都被他们的需要束缚着。只有母亲才知道做母亲意味着什么。人类是唯一孩子需要这样照顾的生物——他们可能从床上滚下来，打破脆弱的头骨，他们几个月不能走路，甚至不能爬行，他

们必须被观察以确保他们不会窒息。孩子们对她的需要让她的生活有了一些意义，但也让她的神经紧张，所以她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有时她会打他们，即使她真的爱他们，并不想伤害他们。最近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这个国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殴打和虐待儿童。

如果妻子和她的丈夫很幸运，他们结婚是因为他们喜欢和对方在一起，那他们结婚后有一些时间为孩子做准备，甚至可能省下一点钱。如果他们因怀孕而结婚，这会增加两者的挫败感。“我们结婚时我已经怀孕了，他忙前忙后”这是许多婚姻常见的故事。无论什么情况下，他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生活在一起可能不太幸福，他也会努力让他们全都吃饱穿暖、安置妥当，她会日复一日地操持着家务。

如果她是白人，他可能接受过高中教育，如果她是黑人或有色人种，她可能在九年级或十年级后离开高中。她阅读杂志，但可能不喜欢阅读别的东西，因为学校教育工人阶级的孩子，他们的聪明程度仅仅只够得上找到一份低薪工作或做一名家庭主妇。

美国梦

换句话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不应该被期待太多，因为我们不会走得太远。然而，男人或女人都大声或默默地梦想着“美国梦”梦想成真。我们被教导“成功”——赚很多钱——造就人，所以他为成功而努力。

我们被教导女人应该会穿着打扮，因此她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和尽可能多的衣服并把头上出现的每根白发都染掉。此外，家庭主妇被要求购买最新的地板蜡，肥皂粉和家具光亮剂，这样她的寓所或就会像广告里所说的那样闪耀。

重要的是她想让家成为一个体面的地方，她知道对丈夫而言养家的压力很重。他经常被保险销售提醒，例如——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他知道任何一场大病医疗都将是一次财务灾难。

由于他们的生活开支总是处在他们收入所能应付的边缘。罢工成为一种威胁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她的工作是照顾家人的日常需要，任何会让它变得更艰难的东西都是对家庭安全的真正威胁。如果她的丈夫没有时间解释在商店和工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可能会反对变革，而不是冒一次风险。因而她继续照顾她的丈夫和孩子，也许期望有一个改变，并希望事情不会变的更糟。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言，情况正在恶化：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税收越来越高，催促，裁员，更多工薪阶层被派往战场（过去只是越南，现在是越南和老挝，很快就会是泰国和柬埔寨）。与此同时失业人数不断加剧，女性受到的打击甚至比男性更严重，对黑人和有色人种女性的打击最为严重。将更多的女性和男性推向极度贫困。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救济金，与此同时政府正在削减福利计划。

现代工业使广大妇女有可能参加劳动，并从事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工作；但在目前的私人资本利润体系下，工人们仍在被迫为公司所有人和经营企业的银行家工作，而非将整个国家伟大的技术进步用来为人民服务。技术被用来制造小玩意，让人们购买那些会散架的东西，并继续为那些旨在让大公司经营下去的新型“国防”武器纳税买单。

为了解放我们自己和我们从这个罪恶的制度中所发展出来的技术，我们必须将每一个被它打败的人团结起来，从而使社会由劳动人民管理，并让它为我们的利益而运转。但是如果不从现在开始在男女之间实现联合，我们就无法建立这种团结。

必须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与其他妇女和男性并肩战斗。如果男性对他们妻子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参加斗争感到是一种威胁，我们就必须确保男性理解妇女解放的意义。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会犯错误，如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即便是失败也可以成为迈向胜利的第一步。妇女解放是在具体层面上处理起来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但它在每个斗争领域中都是最重要的和基本的。

有时候男性欢迎妇女参加他们的游行队伍，只要女人是其他男人的妻子或学生。他们劝阻自己的妻子参加游行队伍。他们不鼓励或阻止自己的妻子去游行，他们知道一旦妻子开始对改变现状感兴趣，他们与妻子的关系将会改变。婚姻关系变化具有威胁性，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改变之后会怎样？但很显然，任何关系都不会保持静止不变——无论进步还是倒退。平等的关系是进步而不是倒退的坚实基础。

我们发现电影《大地之盐》所展现的涉及女性在支持丈夫罢工方面的作用，帮助许多男人打破了对他们妻子参加斗争的抗拒。尽管存在关于妇女解放的友好争论，工人阶级的男人可以赢得胜利，并且是作为争取妇女平等的斗士赢得胜利。一个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拿俄国人开玩笑的工人，他参加罢工队伍并对男人们说在那儿所有女人都在食堂等着男人们。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工人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成为过于依赖他人的人，我们听很多人说他们想要他们的妻子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显然，如果妇女可以在斗争中获得自由发展，许多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婚姻就会得到巩固，而不是破碎。

这里重要的在于，我们这些自认为对妇女解放意味着什么有很好理解的人不能两手空空地陷入我们没有调查过的情况。妇女解放初看起来对男女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威胁，直到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至少知道一点，丈夫通过对自己大男子主义有了新的认识能够挽救婚姻。

这个社会的婚姻通常是不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被一些人批评为“独占”，一些所谓的革命者甚至说，“不结婚，不要孩子”。但很显然，目前客观情况是数百万男女工人结婚生子，而且婚姻和子女与我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基于资本主义竞争社会中关系的不稳定性，人们发展出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是所有方式中最好的一种。也许有一天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中，人们彼此间可以如此轻松自由地相处——不用害怕被彼此伤害——在一夫一妻之外的其它基础上发展深层次关系是可能的。但我们要处理的是现实问题，我们有着普遍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对很多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你没有孩子但生活富裕时，拥有性“自由”是一回事，而当你有了孩子却没有多少钱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必须小心地尊重其他人的个人关系。例如，来自学生运动并且“独立”而不被丈夫和家人“束缚”的女性，必须谨慎不要威胁其他女性的私人关系。这意味着不要跟别的妇女的丈夫眉来眼去，这意味着在聚会中尽量跟女性交谈，在罢工游行中尽可能和男人一样。妇女解放运动被认为意味着性解放。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行动和言论来反击这一观念。共产党人有特殊的责任劝阻其他男性不要将女性视为性对象，不要发表贬低女性的言论。

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需要工人阶级家庭扮演一个保守的角色，让工人保持克制，并对老板们丢下的面包屑心存感激。如果工人阶级家庭团结一致，如果女人和男人在一起工作。家庭可以成为打败帝国主义制度的重要武器。同志们正在研究同彼此的孩子一起工作的方法，让孩子和父母的朋友在一起就像在家里一样。年轻的同志们正在和家里较大的孩子一起工作，这样父母的政见就成为我们孩子的现实，并促成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同志关系日益密切。

妇女通过她们自己的会议——有助于打破我们一直以来被教导的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为了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帮助参与其中的妇女，这些会议不能仅仅是发牢骚的会议，而是必须组织起务实的一致行动。例如，某个小组的妇女们在一起度过这么一天，然后在丈夫下班回家前一个个地把寓所打扫干净。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化家务劳动优势的生动体现。

我们必须帮助妇女培养对自己的信心，使她们相信自己能做的不仅仅是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为此，仅仅聚在一起谈话是不够的。妇女必须积极策划并为了共同目标而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培养我们的技巧与组织能力。在策划活动中，我们必须注意影响妇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影响全体工人阶级的问题。

让丈夫和妻子在影响他们一起工作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以具体的方式推进妇女解放。一位妇女说，大多数已婚夫妇没有共同的活动，如果两个人都在干同样的事情，将有助于巩固他们的关系。在一个地区，工人们和靠救济金生活的人正在组织一个租户协会。妇女们非常踊跃，并且是其中最好的组织者。但她们有小孩需要照看，因此为了解放这些妇女，必须建立一个儿童看护中心。许多人正在组织让男人和妇女平等分担厨房工作的儿童早餐计划，低收入地区正在建立免费的衣食住行和免费的医疗诊所。

医疗保健问题是影响着每一个贫困者和工人的问题，特别是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掌握社会资源，医院和卫生保健机构将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因为人们正在生病和死亡，而他们拥有健康生活的基本权利。我们需要照顾好所有分娩前和分娩后的母亲以及她们的婴儿。现在，只有富人才负担得起良好的产科护理。通常也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合法或非法地堕胎。医院和诊所应该提供免费的节育信息，堕胎手术应该合法、免费、易于获得。与此同时必须停止强迫贫困妇女绝育，应该向所有想要孩子的妇女提供免费医疗。我们必须揭露利用虚假的“人口爆炸”理论强迫妇女实施节育。人们挨饿的真正原因是一一食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大公司囤积居奇——这才是问题的答案。

所谓饥饿是由于世界上人口太多造成的——这种“人口爆炸”观点只是资本家的另一种伎俩。我们知道人们正在挨饿，但原因是少数富人垄断食物供应，并以此赚取利润。在革命前的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人饿死，比现在印度每年饿死的人还要多；食品堆在铁路车厢里腐烂；就像现在的印度一样，人们因为饥饿试图获得那些食物而被枪杀。而现在中国养活了所有人，甚至还出口了一些食物。

人口恐慌只是另一种煽动我们互相攻击的方式，让我们把对方视为敌人，为在越南以及最后会在国内发生的种族灭绝辩护。与此相反，我们需要将精力投入到彼此帮助，一个由健康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控制财富和技术的社会将能够弄清楚我们应该拥有多少孩子。

我们现在必须着手做的另一件事是为我们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儿童保育中心。母亲不能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除非她们有一个照看孩子的好地方。儿童保育中心应该是一个孩子们从小就可以和各种各样人一块做各种各样事的地方。

不幸的是，用来做这些事的钱如今掌握在官僚们的手里——那些大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把我们大部分税金花在了战争以及他们在国内日益增加的警察安保开支上。因此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要求他们在家长督管下为儿童保育中心买单。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维护人民权利的坚强战士。不必害怕孩子会把我们赶出去，他们应被珍爱，因为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我们中许多人最初行动起来始于认识到我们政府的体制、我们交的税款被用来在越南烧死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掠夺他们的财产。当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斗争即是我们的斗争时，我们便成为了革命者——越南妇女拿起枪与男人一起打败了我们同样必须与之战斗的敌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不会使我们气馁，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所有妇女和男性获得解放。

3-3：工作中的女性

“当我听说‘南方女性’是被种族主义者保卫的时候，我不禁笑了出来，我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我不得不做牛做马劳作一生。我洗碗熨衣、采收棉花、在花生田里工作，帮那些有幸在棉纺厂找到工作的妇女照顾孩子。”这些话出自佩吉·泰瑞，她在南方和芝加哥组织工人群众，她用寥寥数语便挑明了当下的现状：富家女子因其温文尔雅又弱不禁风的形象而受到保护，但绝大多数的妇女，即工人阶级的女性却面临这样的现实——有些人“有幸”能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剩下的就只能去照顾孩子，领取着比在棉花作坊工作还要低的收入。社会的每个地方都充斥着不平等，而我们该怎么做？

生育使男女间产生了第一次分工，在早期的原始社会，这种分工促使了女人负责家务劳动，男人则负责出外活动。然而，当一些人私人占有了财产，需要有人为他们工作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打破了这种“天伦之乐”，把女性乃至男性都变成了奴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家开始雇佣妇女乃至儿童作为雇佣奴隶，和男性一同参加工作。

通过不断助长“女性工作的场所就应该在家里”的思想，也让资本家从女性身上获利颇丰。他们能说服一半人让我们女性待在家里，但如果我们女性一定要去工作，那么我们领到的工资会比男性低，失业率也更高，同时，工会也更容易忽视我们，所有工作待遇上的歧视与不公都与这种思想密不可分。这种男尊女卑的制度即是父权的体现，其折射出的思想便是男性沙文主义。

遭受深重剥削的女性

与男工一样，女工们也被剥削，两者都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工人创造了全部的财富，但资本家只把一半付给工人，而剩下的一半就作为“私人利润”流进了资本家个人的口袋里。这种雇佣剥削劳动是利润制度的基础。然而女工们拿到的还远少于男工，她们被剥削得更严重。女工构成了劳动力的40%，这对资本家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利润在不断增长，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占比高速增长，远超男性（从1947年到1964年，在劳动人口中的女性增长了53%而男性只增加了12%），男女工人间的薪酬差距却在不断拉大。（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统计数据均来自美国劳动部妇女局1965年出版的《女工手册》）

很大一部分利润是第三世界的女工创造的。正如一位黑豹党女性成员所言，黑人妇女在美国普遍是穷苦人。工人阶级在美国受到了深重的压迫，而且这种压迫对黑人更甚，而作为黑人女性，她们还在性别上被男人

们(包括黑人男性在内)压迫。(黑豹党姐妹论妇女解放, 1969年9月)第三世界妇女工作的比例比白人妇女高, 她们大多从事最卑微的工作(前提是对妇女开放);她们的失业率最高, 平均收入最低。例如, 在1968年, 平均白人男工的收入为100美元, 黑人工薪男性的收入为68.60美元, 白人工薪女性为58.20美元, 黑人工薪女性仅为45美元。

男女工人必须团结起来

这种团结只能通过围绕劳动人民权利的斗争来实现。若不能成功地建立联盟, 将会导致斗争的失败。举例来说, 去年(文章写于20世纪下半叶)在针对标准石油公司的罢工里, 位于加州里士满的雪佛龙化学公司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会工厂(译者注:指雇佣工会会员的工厂或商店, 其存在是资本家的一种妥协), 因为工会中的大多数男性在罢工之前甚至在罢工期间都忽视了女性的基本诉求。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女性觉得罢工不是属于她们的斗争, 至少不像对于男性那样意义重大。当运动陷入僵局时, 许多妇女展开了一场“复工”运动, 这场运动打断了罢工, 强迫很多工人回到没有工会保护的工厂。

雪佛龙的女工被迫从事最枯燥、薪酬最低的工作, 且晋升无望, 而男工则不然。当他们最初被雇佣的时候, 和女工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 拿着同样的薪水。但他们在几个月内就能晋升到更轻松、薪水更高的岗位。由于这一事实, 加上工会和罢工都是由男性领导的, 让女工们觉得击败这家公司对于她们而言没有太大的利害关系。尽管存在着出于父权制的各种障碍, 但几名激进的女工依然展现了男工和女工平等团结的潜在力量, 她们在罢工中——特别是在斗争一线发挥了领导作用。

妇女必须让男性明白一点:如果老板们能让第三世界的男女工人和白人女性的工资低于他们付给白人男性的工资, 那么这也会使白人男性的工资更低——而这和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例如, 当北方劳工组织起来时, 老板们把纺织厂搬到了南方, 现在南方劳工赢得了一些工资斗争的胜利, 他们就把很多纺织厂搬到了西贡!但是越南人民在与外国侵略者们多年的斗争中建立了一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党, 他们在为了不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奴隶而作斗争。他们武装起来工作以防止美帝的攻击。他们的斗争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纺织厂女工的斗争, 她们拒绝成为老板的雇佣奴隶。

在生产的过程中

每100名职业女性中, 就有15名在工厂工作。在制造业中, 女性更可能从事轻工业商品, 如服装和食品, 而不是重工业商品, 如汽车、机械等。但从1950年到1965年, 女性在电子产品这一重工业领域的就业增长

超过了在传统轻工业产品领域。据说，之所以电子行业采纳女工是因为她们“手巧”。如果这算是原因，为什么医学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呼吁女性担任心脏外科医生呢？在生产中，妇女担当了十分之三的劳动力。妇女和男性产业工人一道构成了工业无产阶级——工人们由于通过实践经验获得的知识得以接受并管理我们的工业，让其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老板服务。

每 100 名职业女性中就有 16 名从事服务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服务员、调酒师和厨师。服务业女工的另一大群体是医院和其他机构的服務者。剩下的则从事私人服务——包括美容师和女佣等等。

最大的女工群体是文职人员，占 32%。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秘书、速记员和打字员。其他的在其他办公室工作和通信工作，主要是电话接线员。尽管美国 70% 的文书工作人员是女性，但其中只有 30% 加入了工会。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女性不愿认同工人阶级，而更愿意相信杂志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这是我们接受的洗脑的一部分，它美化了统治阶级，即使他们正在通过轰炸并饥饿屠杀了数百万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工业无产阶级将成为斗争的先锋。在产业链上的人们不能否认他们是工人阶级，工人们并没有因为摩天大楼、装满衣服的衣橱或官僚机构的花言巧语而脱离现实。

“专家”们也受到迫害

随着斗争的加剧和矛盾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从事护理、教学、社会工作等职业的妇女也加入了革命队伍。许多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都来自这些岗位。特别是护士，她们的职业让她们能够与真正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不仅是因为她们工资微薄，而且她们发现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关系就像小时候医生的工具箱给男孩，护士的工具箱给女孩一样。所以她们对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受的压迫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大多数选择护士作为职业的女性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人道主义愿望，但她们随后见证了不人道的医疗“护理”体系（照顾富人，并尽其所能忽视穷人）。在最近警察杀害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后，一些护士表达了支持社会监管警察的意愿，毕竟她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

为人民服务的人道主义愿望对其他种类的卫生工作者、教师、社会福利工作者、志愿服务队工作者、甚至和平队志愿者和一些律师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一制度迫使他们目睹社会的黑暗：金钱为王。我们最近从一个志愿队工作者那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 5 岁的小女孩爬上了水泥搅拌机酿成了一起事故，并在事故中失去了她的一只手，但作为一个律师，他被要求

提交这样一份报告——将责任全部推到小女孩身上，将公司老板们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律师直接拒绝了这一个要求。

大多数老师都想教书育人。然而热诚的年轻教师们发现他们的主要工作却是像在监狱一样维持学生的纪律。他们很快便理解了第三世界人民所说的有价值的教育的含义——教育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而当他们试图教授学生真才实学时，这相当于在拿他们自己的饭碗在冒险。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和平工作团揭竿而起、护士和教师也开始罢工，这些都是人们的不满日益高涨的证据。

我们能做什么

在争取妇女平等作为人民解放的斗争不可缺少的一步，反对男权主义的斗争必须由工会来进行。在已经有工会的地方，会员资格必须向妇女开放。保护工人的法律和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必须扩大到可以保障所有工人的权利。必须实行同工同酬、无工龄带薪产假、由公司支付并由父母控制的 24 小时托儿所，对于曾经因性别歧视而不能接受培训的女工加以培训。虽然我们明白工会主要是由出卖工人的领导人管理的，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为工会内部的工人利益而斗争。正如匹兹堡-德梅因钢铁公司 (PDM) 罢工工人的妻子所说，我们必须“有组织的罢工”。“妇女党团会议和工会内部的日常运动，以及许多工厂工人组成的团结委员会，也将在这场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1964 年，只有八分之一的女性工人加入工会，而男性工人则有四分之一。在没有工会的地方，我们必须将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从事家务和在农场工作的妇女，在制衣血汗工厂工作的妇女，从事文书和在电子产业工作的妇女，以及从事其他目前基本上没有组织和被工会忽视的劳动妇女。一向在劳工斗争中处于先进地位的纺织女工，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袜子公司领导了一场罢工，要求成立工会。该公司拒绝签署为期 6 个月的合同，但黑人和白人工人（主要是妇女）通过团结一致取得了胜利。

鼓励工会成员的妻子参加工会会议，参与讨论和斗争，这一点是很必要的。若这一措施在匹兹堡-德梅因钢铁公司罢工时得以实行，将有助于工人的妻子们理解并支持罢工。一位非常坚强的智者被任命为由罢工产生的工人委员会主席。

鼓励劳动妇女、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发行工人阶级自己的报纸是必要的，这是组织工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极好的方式，可以在工人中广泛传播斗争经验。我们发现分发工人阶级的报纸是让人民自我发动的绝佳办法，这也是一个与工人交谈的好机会。

我们必须帮助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失业妇女和靠福利生活的妇女。资本主义从来没有提供过充分就业，从本质上讲，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女性工人的失业率最高：白人男性、第三世界男性、白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的失业率也都再次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找工作，这一缺口正在扩大。尼克松正在实施为了减缓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增加失业率的计划，这会在现在和将来持续对工厂工人造成最严重的打击。

而且很多女性只做兼职。对资本家来说，利用兼职女性来填补劳动力空缺是一笔意外之财，他们用这种方式避免了兑现全职工人斗争而得来的许多附加福利。在农田里工作的人——佃农的妻子和女儿、南方的黑人移民劳工、西南地区的棕色（人种）农场工人——只在某些季节才能找到工作，他们是这个国家受到最为深重压迫的人之一。

现代工业使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它并没有使所有的妇女都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正如它不能使所有的男人都有工作一样，所以社会提供了所谓的“福利”。加州圣克拉拉县被认为是全美最富有的县之一（人均年收入约为 1.3 万美元），现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圣克拉拉因福利大幅增加而陷入危机。”（旧金山纪事报，1970 年 2 月 21 日）“由于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大批新的福利领取者，包括许多以前从未享受过福利的中产阶级人士，正被推入福利名单，”一位福利发言人表示。“像洛克希德这样的大雇主，因为失去政府合同而裁员。”我们必须设法满足一切受压迫和剥削的妇女的需要，团结妇女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组织形式有很多种：在工会和工人委员会内部、与报纸有关的工作、儿童保健组织（为在职和在家的妇女而建立的组织）、租客工会、妇女团体，妇女在那里一起读书、谈话、看电影等等，它可以是任何符合人民需要的形式。我们需要交流从失败和成功中获得的经验。

3-4: 福利：一个巨大的谎言

去年秋天，尼克松突然宣布计划削减福利开支。这将取消使得 400 万在生死线上的儿童得以存活的“援助受抚养儿童计划”。不仅如此，虽然如今食物价格远高于以往且在进一步上涨，单食品券也将遭到了与前者同样的命运。

为了替代旧的福利制度，尼克松计划一个四口之家的最低年收入划为 1600 美元！同时为了获取这些最低收入，我们中一些依靠福利生存的人将不得不去进行一些强制性劳动——要么为政府本身，要么为那些维持政府运转的大公司。

在宣布这个消息后，尼克松突然就放弃了削减福利的计划——当然，是暂时放弃。他计划在在国会上进行提交。但首先大资本家不得不努力去给劳动人民洗脑。他们又一次在散布那些关于福利的旧谎言——只有懒人才享受的到福利，那些靠福利过活的人比勤劳工作的人过的还要好，吃福利的人把补助花在酒精或者豪车上……以及诸如此类的富人编造的谎言。

统治阶级的银行家和大工厂主不仅利用他们的那些传统喉舌——州长、参议院、国会议员及福利管理者等等。如今他们甚至有几首“流行”歌曲来推行他们的福利政策。

在美国乃至西方音乐界，极右翼歌曲《福利凯迪拉克》(the Welfare Cadillac)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据说这首歌是一个靠领取福利金过活的乡下人唱的，但其实际上是对那些领取福利的人——尤其是对贫穷的黑人展开的一场充斥着谎言的攻击。这首歌描述了一个住在破旧房屋里而不照顾自己家庭的人（他的孩子们有免费的午餐，而且他们能从救世军那里得到衣物）他说很多人叫他傻瓜，但他认为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傻瓜，因为他用他的补助金每年可以买了一辆全新的凯迪拉克轿车，而其他人在这时只能不停地工作并通过纳税送孩子上学。最重要的是，情况正在变得更好，一位新总统将会推出了一个新的贫困救济项目，给了穷人一大笔钱，这样他的妻子就能也买一辆新的凯迪拉克。

任何一个靠救济维持家庭生计的人都知道这首所谓的“歌”都充斥着什么样的垃圾。通过政府自己的数据就能明白，每时每刻大约都有 8 百万人靠救济生活，尽管在任何时候每 100 人中就有 10 个人领取救济。

在这 8 百万人中，只有 6 万人有着健全的身体能够工作，两百万人是大于 65 岁的退休人士，他们已经为那些掌管着社会的资产阶级猪头做牛做马了一辈子。约一百多万人是盲人或者残疾人。而其中稀少的近乎为零的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才会用福利金买凯迪拉克。确实有些地区存在免费午

餐项目。但那只是因为当地人们不断地斗争，以及革命组织，诸如黑豹党为学校儿童提供的让政府无地自容的免费早餐的计划。

而且新总统不可能再提出任何新的贫困救济政策，歌中出现的所谓“大袋子里装着免费的钱”不过是无稽之谈。我们十分清楚他们在不断削减福利以及其他旨在帮助穷人的政策计划。

《福利凯迪拉克》似乎还不够坏，“灵魂”电台正在不断地播放一首叫《福利蓝调》的歌曲——依旧充斥着相同的极右翼谎言。《福利蓝调》讲述了靠补助金生活的女性只为更多的补助金就不断地生孩子。而她们之后却用这些钱去市中心买奢侈品，把她们的孩子抛在脑后。

真相何在？

在加利福尼亚——福利最“好”的几个州之一，一位有着一个孩子的母亲能够每月拿到一笔不到 150 美元的福利金，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能拿到几张食品券和部分医疗报销额度。有了这些钱，她可以买食品券，并且付得起房租，让她的孩子能够吃饱穿暖。不要去想任何其他的开销，这都在考虑之外。而如果她有了第二个小孩，她只能再拿大约每月 20 美元。

为了能够得到这样的“施舍”，她不得不回答各种侮辱性的私人问题，包括怀孕的地点、谁在现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尼克松和其他统治阶级的喉舌竟厚颜无耻地说他们削减福利是因为它是“有辱人格”的。是的，有辱人格确有其事。但你看待它的方式取决于你自己或羞辱别人的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这两者中谁是被羞辱的一方。他们应该被唾弃——也就是说，他们从阶级的意义上应该被粉碎——由于他们的统治，导致失业率不断上升，人民不再有劳动的尊严。在诸如汽车工业等关键行业，已经有许多工龄长的老员工被裁掉了。

这首歌和它出现的时间点都不是偶然。这是统治阶级和他所圈养的媒体所展开的宣传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为进一步压迫穷人铺平道路。一位领取补助金的阶级姐妹作为福利权利组织的一员这样说道：“纳税人协会说我们不劳而获从而丧失了尊严。我想补助的接受者和纳税人协会看待事物的角度完全不同。我们从来不是无偿地从纳税人那里拿钱。我们必须接受那些最下贱的要求才能得到这笔钱。为了 200 美元的补助金你不得被骚扰一整个月。”（来源于福利权利组织的一个典型例子）

不幸的是，就连我们当中一些领取救济金的人也将这些污蔑我们是乞丐、不劳而获的荒诞言论信以为真。这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福利产生的历史源流，以及我们无产阶级是如何为之奋斗并取得胜利的。

我们甚至不明白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给我们福利——或者说为什么他们如今妄图取消福利制度。

福利制度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劳动人民——特别是失业工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数百万失业工人游行示威，要求脱离饥饿和苦难。他们不得不去站起来去反抗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率领的警察和军队。许多劳动人民遭到枪击、殴打和监禁。但是他们团结了起来并以百万之势进行斗争。他们也确实取得了许多真正的胜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以及福利制度。当时，大多数失业者和穷人都是白人，但现在贫困和失业的最沉重负担落在黑人和棕色人种身上。如今八百万领取福利的人中有 600 万，即接近四分之三的人是白人。按照联邦政府的标准，一个年收入 3000 美元以下的四口家庭处在贫困线以下，这么计算美国大约有 5000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 1 个贫困人口。在这 5000 万人中，四分之一是黑人或者拉丁裔，也就是说剩下四分之三是白人。他们生活在阿巴拉契山脉、乡村——尤其是南部以及大城市的贫民窟中。因此，即便黑人和拉丁裔过着最贫困的生活，但贫困仍旧是所有劳动人民的问题。尤其应当记住的是，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并没有能领取补助，而是从事着诸如洗碗工、厨师、服务员、女仆、加油站服务、南方纺织工厂和北方血汗工厂的流水线工人之类的低贱而收入微薄的工作。例如许多妇女参与的纺织行业，一个小时的工资甚至不到一美元。而那些参加工会以获取更高工资的工人即便在最好的时候也不过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

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如此残酷的压迫我们

现在的情况很糟。越来越多的家庭，丈夫和妻子一起，都被迫领取补助金，而工作越来越难找，失业救济金也越来越难以领取。福利并不是从那些辛勤工作的人那里夺来的。通常，只有当老板不让他们工作，或者他们为了维持生活开销而罢工时，福利制度才被作为最终手段被使用。最近，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湾区，标准石油和陶氏化工的罢工工人只能靠补助金在罢工期间生活，只有这样他们的家庭才不会挨饿或者被赶出他们的公寓或房屋。

若不算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单亲母亲仍旧是领取补助的最大群体。为什么政府一开始给了这些女性一些慰问补助，而现在又为什么要把这些都从她们那里夺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了——总计 1700 万人，工人阶级受够了那帮资本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者和其他积极的工人领袖为穷人和失业者争取救济的斗争。数百万工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团结到了一起。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确信了资本主义是无法满足社会的绝大多数——即劳动人民的基本需求的。对少数银行家和大工厂主的反抗日益高涨，他们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并在其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此时数百万人则在排队领取面包，甚至忍饥挨饿。

尽管大萧条的情况是如此糟，但其依旧未能终结大资本家和他们赖以犯下如此罪行的社会体系。由大资本家组成的统治阶级通过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将资本输出到全球——亚欧非和拉丁美洲建立血汗工厂，这才得以暂时摆脱危机。他们也对人民实施了一些“让步”：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福利制度——只足以让大多数工薪阶层有那么一丝安全感，并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大资本家们需要工人世世代代为他们制造产品，为他们产生利润。

他们从前乐意给有孩子的母亲福利，尽管她们无法直接给老板们提供利润，但她们的孩子将来也会成长成工人或者成为冷战的炮灰——在朝鲜、越南、老挝……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人。短时间内，这对那帮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有利的，但之后情况就开始恶化了。在诸如中国、韩国和越南之类的落后国家的人们开始反抗美国大公司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苦难。在他们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些国家的人们驱逐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大公司。他们也不得不奋力反抗美国强大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是麦克阿瑟）或者美帝在当地的傀儡政权。但在中国，人民胜利了，他们终结了外国大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和作为他们后盾的外国军队对中国的控制。他们夺回了他们自己建造的工厂、他们自己开采的矿山和油田、他们自己铺设的铁路和他们自己耕作的田地。他们团结在一起，不断地奋斗，从而让中国从数个世纪的苦难中挣脱出来。而这正是越南人民如今所正在做的事情。

而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在中东，在非洲，在拉美，人民正在觉醒并开始反抗压迫。

所以美国大资本家的时间不多了。他们确实还是站在世界金字塔的顶端，但整个世界都在挣脱束缚推翻他们的统治。如今这些资本家又一次拿我们——美国的劳动人民来出气。他们的整个体系开始分崩离析。他们面对着有一场像 30 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大危机。但这次不会像 30 年代。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们已经不再有“小恩小惠”可以来向我们妥协。他们已经陷入了疯狂。他们收回了一些曾经“施舍”给我们的“小恩小惠”。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直接从我们这里拿走他们的利润。他们

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一个以美国最强大的金融寡头——诸如美国银行、标准石油、通用汽车等集团为核心的公开的恐怖统治。

他们没有为工人的未来做任何考虑。他们只知道必须今天尽其所能地压榨工人。他们不再能允许找不到工作的单亲母亲、寡妇、依靠补助生活的女性蚕食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当然也不能允许让孩子进入社会，因为这些孩子不会有工作的前景而资本家也不会用额外的利润去抚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如今福利被削减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女性——特别是黑人和拉丁裔女性被骗到郊区医院做绝育手术。那些那些幸而还有一份工作的劳动人民也被逼到了绝境——他们的工资远远落后于暴涨的物价和税收，而这仅仅是为了维护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家们的私人利益。

现有的税收已经把工人们压榨到没有余力为福利买单，因为之后他们也会陷入困境寻求解放。法西斯主义以暴力疯狂压榨劳动人民，而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则没有活下去的资格。

前路何方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走向法西斯主义象征着我们的敌人——大资产阶级的绝望，也是他们的巨大弱点。我们必须明白正是因为那些资本家已经无路可走，所以摆在我们劳动人民面前只有那么一条路：团结起来积蓄力量，共同与他们斗争。我们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以防止他们彻底摧毁和屠杀我们。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必须明白资本主义体系是导致劳动人民混乱和痛苦的元凶。而只有社会主义——由劳动人民自己经营工业、掌管信贷，建立为大众利益服务的政府，才能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提供真正的社会保障。

我们必须立刻清醒认识到这些削减福利的行动只是资本家榨干我们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构成法西斯体制的关键部分。我们必须把争取福利的斗争同反对裁员和减薪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我们必须保卫黑豹党这样的政治革命组织，他们必然是法西斯大资本的首要攻击目标，而正是他们在带领着我们进行斗争。我们必须迫使美国政府撤出越南和其他那些它所掠夺的国家，因为这将严重削弱那些美国资本家，并从而帮助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姐妹进行他们的斗争。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力量聚集起来，联合所有真正的朋友，从而推翻这个只会带来苦难的私有制体系。

把劳动人民背上沉重的赋税扔回资本家身上可以是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妇女的福利事业，以击退法西斯分子对她们的进攻。法西斯化的统治阶级相信通过特别恶毒的方式攻击妇女能够分化并粉碎我们。他们希望我们会被他们虚假的宣传所迷惑，从而袖手旁观，从

而使妇女在失败中倒下。但他们将会大失所望。妇女、穷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都会团结起来并回击他们在向法西斯主义一路狂飙的道路上的所作所为。

接受社会救济的妇女已经开始反击了。在特拉华、波士顿、密歇根和威斯康星，妇女正在夺取福利机构甚至州议会以寻求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在旧金山，领取社会救济的妇女动员社会力量占领了一处州议会以抗议政府威胁削减开支。支持福利争取权利斗争的群体正在愈发壮大，并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开始合流。我们将共同抵制生活环境和 work 环境的恶化，并在资本家的贪婪中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联合每个反对大资本家及其法西斯主义攻击的群体和个人的统一战线。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将挖掘并培养出那些最勇敢、最具自我牺牲精神且最有远见的人作为我们的领导人。这会是我们重建共产党的核心——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货真价实的战斗组织，无分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丁裔、黄种人、印第安人。这个共产党将在许多斗争中领导我们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让不断恶化的贫困状况永远消失。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将一起掌控工业和田地。在每个人各取所需后，我们将决定如何利用我们共同的利润——富裕的产品。我们将建立新的工厂，建造新的机器和交通系统，修建公园、剧院、学校、医院和其他那些我们和未来的劳动人民所需要的那些东西，未来的劳动人民也将一起继承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自动化会让我们下岗并迫使我们争夺剩下的工作机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却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将不会再需要失业保险和福利，因为每个人都将有足够的工作——无论男女——在所有的工作领域。将会有足够的产品供我们舒适地生活。

这不是幻想，在中国等一些国家这一切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们能够让这一切在美国发生——让我们团结起来斗争并粉碎资本家奴役我们的每一个链条——尤其是对黑人和拉丁裔的压迫和对妇女的贬低。

3-5：美国历史上的工人阶级妇女的斗争

在美国劳工史上，女性创造了一些最辉煌的时刻。不论是作为工人组织起来罢工，亦或者是在她们丈夫的罢工运动中起领导性作用，工人阶级妇女长期以来拥有着悠久的战斗传统和仇恨不公的传统。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市的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联合起来赢得一场为期六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的妇女群体的先祖也曾经是伟大的工人阶级先驱，她们的祖先在 146 年前与男性工友们一同参与罗德岛的工人阶级罢工。这是已知最早的（1824 年）女性工人的罢工，它标志着美国女性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从 146 年前直到现在，她们一直战斗在罢工的最前线，面对着牺牲和苦难，她们毫不动摇并且坚决与美国资产阶级作出明确的斗争，积极地组织罢工和勇敢建立党组织工作。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妇女斗争行为也为资产阶级的女性的参政运动提供了榜样：工人阶级的妇女们证明了女性并非天生弱小、被动、软弱的；她们必须在工厂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每天工作 12 小时，才能每周挣 1.25 美元——工人阶级妇女的战斗精神为她们资产阶级的“姐妹们”赢得妇女投票权的成就提供了勇气。

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性工人

美国第一批白人女性工人是帮助在大西洋沿岸定居的先驱。当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印第安人妇女就已经长期参庄稼种植与手工制造等生产活动了。建立新定居点的英国商人意识到，如果要让男性占多数的定居点成为稳定的社区，就需要更多的女性来平衡它们畸形的社会男女比例。因此他们把数以千计的女性做成商品广告并且运输，这些悲惨的女性被当成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新型商品“奴隶”出售给那些新大陆的定居者们。

有些人过得没有那么自由。如果商人想要成功的话，新的殖民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于是他们开始购买契约劳工与黑奴。契约仆役被迫去为一个“主人”在特定的时间工作，这些契约劳工过的生活比奴隶好不到哪里去。例如，一些人是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而自愿到来，而其他人是被从非洲故乡诱拐、绑架而来。契约仆役在成功完成了他们的契约期后，将可以“自由”地被继续交易当成新的契约劳工或者结婚。但是许多人只不过是从一个地狱到新的地狱的苦逼白人而已。

但是，黑奴从来没有自由的机会。如果他们在从非洲到美洲的地狱之旅中幸存下来，那么他们将成为终生的拍卖品，完全听凭奴隶主的摆布。黑人妇女被当成生育机器用来生育更多的奴隶，和她们的丈夫孩子一起做艰苦的日常工作。但

他们原有的奴隶主可以通过向不同奴隶主出售他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时候，他/她们的丈夫和妻子，父母与孩子将一生不得相见，他们各自会被卖到新的地方继续当奴隶。

妇女进入工厂

随着美国北部工业化大生产生产关系的开始，妇女们开始在工厂中使用织布机与其他机器。许多人已经在家里工作，生产服装、帽子、布料和鞋子，但这些工厂使得自制商品无法在市场上竞争。许多女性被迫竞争不安全工厂的低薪（每天 25 美分）工作。

1828 年，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老板们在美国劳工史上第一次召集国民卫队来镇压“儿童”（包括大量女孩）发起的罢工。他们抗议强制性的 12 小时工作制与午休时间减少。第二天，工厂里的木匠、机械工和泥瓦匠出于同情的态度也参与了这次罢工。第一次工厂中全体女工的罢工发生在那一年十二月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多佛的纺织厂里。300 至 400 名女工走上街头，《费城国家公报》半开玩笑地抱怨道：“州长可能不得不召集民兵来阻止女性参与政治斗争”。

1834 年，多佛的女性又一次走上街头。她们必须在组建工会方面取得了进展，因为老板们将会以“铁腕”誓言反对工会，以此作为解决工会问题的解决方式。

工人阶级的妇女们开始联合起来

1834 年，马萨诸塞州洛威尔市的纺织厂工人开始罢工并且要求组建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他们也反对减少工人 25% 的工资。当一名被解雇的女工在离开队伍时在空中挥舞自己的帽子时，罢工爆发了。其中一位罢工领导人做出了《波士顿时报》(Boston Transcript)所描述的事情：

一场关于妇女权利和“蒙面贵族”罪恶的玛丽沃斯通克拉斯的演讲，对她的听众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如果他们为此而死，她们有自己的决心和自己的方式。超过一千名女性离开工厂走上街头，唱到：

噢，像我这样漂亮的女孩，真可惜

就应该送到工厂去憔悴而死吗？

哦，我不能做奴隶，

因为我向往着自由。

然而这场罢工被破坏了，但洛威尔的公司宿舍成了组织工人活动的中心。两年后，2500 名工人在罢工中的洛威尔工厂成立了女工协会。它和罢工一起被摧毁，但它所奠定的组织基础却帮助妇女们成功地抵制了当年晚些时候的赶工要求。

1833年，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鞋厂女工成立了一个松散的工会，这个工会随后成功抵制了一次降薪。1835年，其他组织在纽约和费城相继成立。第二年，在第二次洛威尔罢工一个月后，由男性工人组成的全国总工会举办了第三次大会，主张组织妇女（工人）组建属于她们自己的工会。

洛威尔的组织后来得到了重建。洛威尔女性劳动改革协会是作为新英格兰工人协会的附属机构而建立。在长期工作于洛威尔工厂的工人莎拉·巴格丽的发起和领导下，该协会成功地抵制了整个19世纪40年代的赶工要求。在巴格丽的领导下，女性劳动改革协会开始扩展到其他市镇。它们中的许多分会积极地为争取10小时工作制而努力。当工人愤怒迫使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审查关于缩短工人工时的要求时，委员会中的政客提到，“由于大部分请愿者是女性，她们有必要对此减少工时的运动进行辩护，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将这次工运的要求搁置一边。”

男女（工人）的联合

然而，男性工人对女性工人有更高的评价。在1846年，也就是马萨诸塞州的议会请愿运动失败后的第二年，3名巴格丽的女性同伴加入了新英格兰劳工改革协会原先由5名男性构成的理事会（这一男女比例高于目前大多数工会的领导层）。随着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在男性工人中逐渐减少，阶级意识——通常是由于女性的领导——逐渐增强了。一家工会报纸报道了纽约女裁缝的一次群众性集会，抱怨说皮条客在人群中四处游荡，试图以每人4美分的价格来“购买”女裁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激进的原因，”这个集会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看到有钱的老板去锄地，富有的女士们去洗马桶。”

在1840年，这场激烈的罢工运动持续了一天。尽管一些法律获得通过，但老板们要么忽视这些法律，要么延长工时或者加速生产（注：指加快劳动过程，提高劳动强度）——在今天，相同的伎俩依然被用在工人身上。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2000名纺织工人在10小时后离开了工作，执行据说于1848年7月4日在州内生效的法律。第二天，他们被锁在了工厂外面。到了月底，老板们找到了100名支持12小时工作制的工贼们，工厂得以重新开工。那些仍然被锁在工厂外面的工人妇女们的对付这些工贼们反应迅速而有效。一份当时的报纸报道说：

工厂大门周围聚集了大量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公开表示当那些已经复工的工贼们出来吃饭时要展开报复。当他们（工人们）等得不耐烦后，工人们最终开始尝试暴力手段破门而入。工人们人手一把斧头，妇女们抓着斧头，她们像一个真正的亚马逊女战士一样燃烧着工人阶级的怒火与战斗精神把大门破开。人

们不约而同地冲进了工厂。妇女们奋勇当先，后面跟着气势汹汹的男人们。前面的姑娘们充当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战士，她们勇猛地从栅栏上扯下了木板来打开一个缺口，方便让工人们如同暴风雨般的怒吼冲向那群无耻的工贼和资产阶级的老板们。

当他们突破敌人紧缩的工厂大门，英勇的工人们把龟缩在工厂里面的阿勒格尼的警察和工贼们打得落花流水。到8月底，阿勒格尼的工厂除一家外全部实行10小时工作制，尽管降低了一部分薪水。

黑人男女（工人）的联合

当白人女工们开始组织起来，为她们的自由而战斗的时候，黑人妇女和男人们也在反抗着奴隶制。1831年奈特·特纳领导的奴隶起义与关于“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译注：由南方的蓄奴州向北方的自由州逃离的一系列道路网络的统称，其方式包括了铁路、公路和水路，并不真的在地下）的传言激励众多南方种植园中的奴隶逃向北方。

当奈特·特纳起义爆发的时候，出生在奴隶家庭的哈丽雅特·塔布曼11岁，几年后，她自己帮助了一名奴隶奴隶逃脱，这是她日后帮助解放的300名奴隶中的第一个。尽管她个子不高，但等到她29岁逃脱时，在田里多年的辛勤劳作已经使她比许多男人都强壮了。她的同胞们尊敬地称呼她为摩西，因为她在“地下铁路”里带领他们走向自由——从一个友好的农场到另一个友好的农场，穿过沼泽和森林，再到北方。她带着左轮手枪保护她的旅客，没有一个人在途中丧生或被捕。对于奴隶主们来说，卷走了价值数千美元的人类“财产”的“摩西”是一个狡猾、危险的男人。他们为了抓住“他”而开出了40000美元的悬赏。

索杰娜·特鲁斯则是另一位为了消灭奴隶制而毕生都在与奴隶制作斗争的奴隶。她在全国各地的废奴主义者会议上发言。她还支持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在一次妇女权利会议上，在一位男性部长宣扬男性的优越性后，她勇敢的站了起来，做出了令人难忘的反驳：“那边那个男人说女人需要有人搀扶才能进入车厢，扶着她们过水沟，让她们在任何地方都有最好的位置。但是从来没有人帮我上马车，或帮我过泥坑，或给我任何最好的位置，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吗？看看我！看看我的胳膊！我耕种，栽植，把产品搬到仓库里，没有男人能赶得上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可以和男人一样多地工作，一样多地吃（当我有能力的时候），还可以忍受鞭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我生了五个孩子，眼看着他们大多被卖为奴隶，当我像母亲一样悲伤地哭喊时，只有耶稣听见了——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吗？”

许多富有的白人妇女也公开反对奴隶制，并通过她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工作参与了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萨拉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等人就奴隶制的惨状进行了演讲和写作。在当时，女性被认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谈论任何事情，这些姐妹们被部长们批评为“不自然”的女性。但她们继续鼓动反对奴隶制，并展示了奴隶的苦难与在污秽的工厂工作、工资不到男性一半的女性工资奴隶的苦难之间的相似性。

妇女们继续组织起来

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内战中，女工们与日益增加的苦难作斗争，但有时也会遭受挫折。当她们争取到较短的工作制时，工人们也经常遇到工资降低或者加速生产。在这段时间里，为数不多的真正成功的妇女组织之一是纽约州特洛伊市的衣领清洗工会 (Collar Laundry Union)。到 1866 年，它成功使周薪从 2 美元提高到 8 美元，并且有能力为正在罢工的特洛伊铸铁工人贡献 1000 美元。工会主席凯特·马拉尼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的助理部长。但是三年后，工会和它建立作为给老板们打工的替代品的合作洗衣厂都被捣毁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妇女们所依赖的特洛伊铸铁工人主席的去世。

然而，马萨诸塞州福尔河纺织工会的妇女，比起相信工会的男性成员，她们更相信自己。1873 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男性工人们投票同意减薪 10%。这些妇女举行了属于她们自己的集会，禁止男性工人出席这次集会，并且投票决定罢工。男人们随后跟着她们一起罢工，在经历了与工厂老板们三个月的艰苦斗争后，工人们取得了胜利。

尽管妇女一次又一次地在劳资纠纷中表现出了斗争精神，但这些年来，全国工会往往不愿意接纳妇女。在妇女们出现在劳工斗争的最前线近 50 年后的 1873 年，在 32 个全国性工会中，只有雪茄制造工人协会和印刷工人协会有女性会员。

（印刷工人们曾一度就开除与妇女在同一家商店工作的任何成员的决议进行过辩论。）这些工会承认，他们担心女性会抢走男性的工作，导致他们工资下降。当时和现在一样，工会的领导层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老板们可以随意地少付给一部分工人工资，那么所有工人的工资和工作保障都会处在危险之中。

“组织妇女，坚持同工同酬”这个思想被越来越多地在美国国民中提及。然而，几乎所有的妇女组织都是由妇女自己组织的。1869 年，马萨诸塞州林恩市的激进的制鞋工人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女工组织。这个被称作“圣克里斯汀的女儿们”的组织被作为男性制鞋工人协会的辅助组织。三年后，林恩当地的居民控

败了一次减薪，并通过了一项激动人心的决议：“我们，自由的林恩妇女们，不会屈服于任何一项或一套会贬低和奴役我们的规则。”

1886年，崛起的劳工骑士团——第一个真正强大全国性劳工组织，他们鼓励女性加入组织——任命了一个全职的妇女组织者，尽管这一职位是在参加了早期的骑士大会的少数女性代表的努力下才设立的。袜机操作员利奥诺拉·M·巴里担任这一职位。在接下来的三年半里，她几乎一直在奔波。到1888年，通过她的努力，大约有11000到12000名女性加入了骑士团。

尽管如此，巴里还是觉得在女工中组织起来很困难，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她们习惯于服从和接受别人提出的任何条件，对生活抱着悲观的态度，看不到一丝希望。”拥有更好工作的女性不会加入那些受到更多剥削的群体。许多妇女“由于愚蠢的骄傲、拘谨的谦虚和宗教上的顾虑而不敢加入劳工组织”而一个普遍存在的，适用于所有处于“女性鼎盛时期”的人的原因，是她们希望和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的婚姻将会将她们从工业生活中拉到平静而又舒适的家庭中，愚蠢地幻想随着结婚，她们与劳动的联系以及利益关系将会结束；“然而，常常发现的是，当她们发觉这样得不偿失时，她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所有这些都是过去和现在围绕妇女的环境和条件的结果或影响，这些东西只有通过不断的鼓动和教育才能消除这些愚蠢的幻想。”（原文的引号是乱序的）

其他女性组织者奋起承担起这项“不断鼓动和教育”的工作，这项工作在今天和世纪之交一样必要。

“母亲”琼斯与老板们做斗争

与早期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关联在一起的最高效的“鼓动者”与“教育者”，是玛丽·琼斯“母亲”。琼斯于1830年出生在爱尔兰，她的四个孩子与丈夫都丧生在了了一场流行病（译注：1867年的田纳西州黄热病流行）中。她之后成为劳工骑士团和矿工的组织者，50年来，她一直处于那个时代矿场暴力罢工的中心。她奔走于多起罢工之间，不知疲倦地向男女工人们发表演说。她与矿工工会的行动无所畏惧，并且令人难忘——她曾经告诉那些罢工的男人呆在家里照顾孩子，而她则带领着他们的一群携带拖把的妻子去赶走矿井里的工贼——在整个劳工运动中建立了真正的团结。她认为，与为全体劳动人民赢得经济公正比起来，为妇女赢得选票是次要的。

在她于1930年去世后（享年100岁），一首能证明她的工作的歌在煤矿工人中流传起来：

今天，全世界都在哀悼琼斯母亲的去世；
悲伤和哀痛笼罩着矿工们的家

这位伟大的老劳工斗士已经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但是那些辛勤工作的矿工，他们依旧想念她的指引

在每一个矿业小镇上，琼斯妈妈都要翻山越岭地帮助他们；
她从不让他们失望。在罢工的矿工面前，总能找到她；
她为正义和公正而战；她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战。

从 1895 年到 1905 年，女工们总共参与了超过 1200 次罢工。然而，她们组织的真正转折点直到 1909 年“两万人起义 (Uprising of Twenty Thousand)”时才到来。纽约两家制衣厂的女制衣工人已经罢工一个月了，当时全市所有制衣厂的女性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会。当会议开始沦为演讲时，一名十几岁的名叫克拉拉·莱姆利希的罢工者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她已经被警察在纠察线上打断了几根肋骨。

“我是一名工人女孩，也是那些罢工反对无法忍受的状况的人之一。我已经受够了那些演讲者的泛泛之论。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决定我们是否还要罢工。因此我提出一项决议，立即宣布进行总罢工！”

第二天，2 万至 3 万名妇女参加了罢工，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罢工，也是“对妇女无法组织起来的陈腐论点的有力回应”。在罢工期间，有时一天有多达 1500 名妇女加入制衣工人协会。这些妇女在冬天里坚持了三个月，许多人被捕。

“面包与玫瑰”

不久之后，成千上万的妇女被组织起来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安娜·洛皮佐就是在这里被警察杀害的)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的纺织工人罢工。她们打出了“面包与玫瑰”的口号，并且受到罢工启发的一首诗讲述了妇女们游行的原因：

当我们前进，前进的时候，我们带来更伟大的时期；

女性的崛起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的崛起。

不再是做苦工和懒汉，

而是分享生命的荣耀，面包和玫瑰，面包和玫瑰。

按照琼斯母亲(传下来)的传统，艾拉·里夫·布洛尔是一位劳工组织者，她认为有必要改变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1912 年，她作为女权主义者参与竞选，但是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总是试图表明，我们运动的对象并不只是获得选票，而是去让妇女做好使用投票的权力来为女性获取体面的收入与待遇并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的准备。”艾拉·布洛尔曾经目睹过 73 名儿童在一场罢工的一个插曲中窒息而死。

当她为工人运动工作时，这样的情景总是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艾拉·布洛尔因为其为社会主义者的“男人的政党”工作而被女权主义者责骂，但她仍然忠诚于她的信仰并在 57 岁的时候加入了新的共产党。伊丽莎白·格林·弗林是另一名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工人领袖，在当时美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坚强捍卫者。

30 年代最大的罢工之一是 1936 年至 1937 年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举行的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静坐罢工。在与通用汽车老板与警察的长期暴力斗争中，成千上万的罢工汽车工人的妻子发挥了关键作用。妻子们不仅为 1200 名在工厂中的罢工者提供了食物，还组织了妇女们的紧急旅。数百名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妇女们用宽四寸厚二尺的木板、炉具、撬棍和铅管来应对紧急情况，不止一次地阻止了警察与军队闯入工厂里。

工人的妻子与母亲——其中许多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在 1950 年至 1952 年间的新墨西哥州贝亚德的帝国锌公司的矿工长期罢工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公司要求法院发布禁令禁止男性的任何罢工行为时，妇女们接管了纠察工作。妇女和儿童冒着催泪瓦斯和暴力走上了纠察线，即使被逮捕和监禁也没有放弃斗争，最终，矿工们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最近，在去年（上世纪七十年代），矿工的妻子们迫使西弗吉尼亚的 3 家矿场关门来反对（矿场）解雇工会干部。（同样在）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的匹兹堡—得梅因钢铁工人罢工期间，罢工工人的妻子们、女学生和家庭主妇们多次加入罢工的队伍并且在工贼与公司官员的住宅前设置了纠察队。

棕色人种的妇女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加州农场工人协会的斗争，并在全国性抵制加州葡萄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尽管她们有着坚强与富有战斗性的传统，女工们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无组织的。尽管女性占美国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但 1964 年只有五分之一的工会成员是女性。随着裁员、物价上涨与福利削减的增多，组织起女性工人的需求在今天与以前一样强烈。今天，工人阶级妇女们正在按照她们过去姐妹的传统，奋起反抗。工人阶级妇女在旧金山的服装业血汗工厂、李维斯以及其他在南方各州和北方大城市的服装制造商，以及在医疗与电话行业中进行组织，将会继续为了经济正义而斗争，并将站在终结奴役我们所有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最前线。

红色文件 3-6：龌龊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电话公司里愤怒的工人们

在我工作的那座城市里，电话公司雇佣了超过 14000 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她们从事着接线员、服务代表和操作员等工作。这些妇女日复一日地整理着成千上万的文件，并安抚着愤怒的顾客。像在任何工作场所里一样，妇女被迫只能做最枯燥的工作，拿着不及标准收入的薪水，如童工和奴隶般被对待。在电话公司的工人中，女接线员受到的剥削最重。她们拿着最低的薪水，忍受着电信系统所有工种中最糟糕的工作环境。她们是率先奋起反抗的。

在电话公司的大楼里，数百名接线员坐在阴暗拥挤的房间里。设备紧贴着墙摆放，所以接线员们面朝墙壁坐成两排。在她们的背后，在房间的中心处，桌子几乎都是空着的。监工们就坐在这些桌子上，盯着这些接线员们的后脑勺，以便找出谁放慢了工作的速度，或者谁又和旁边的工作人员交头接耳。

接线员之间的闲谈是不被允许的，即便打进电话的频率很低而工人们无所事事时，她们依然得遵守规定。在接线员与顾客之间也不允许闲聊，尽管这更难管控。公司希望全国所有的接线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美地重复专业的话语。这些被设计好的话语能够用最短的句子传达最多的信息。但是，尽管这些话都是被设计的更有效率的，它们却常常是模糊难懂的。例如，当一位顾客想要知道一条电话线路是否正处于繁忙或占线中时，接线员需要说：“这样做可能会中断谈话，且您需要有足够的理由来确保线路的安全。请问您希望这么做吗？”大多数情况下这位顾客不能理解到所有信息，并会开始没有耐心地对接线员喊叫，让接线员开始检查线路。如果接线员能够用自己的话向顾客阐明检查线路的相关事项，这些规定的语句完全可以被抛弃。但接线员该怎么做是公司定的，并且公司决定保留这些语句，因为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更多的利润。

不管接线员个人出了什么情况，她们都不能迟到或生病，否则她们的工作就不保了。当她们投入工作时，她们必须戴好耳机进入房间，在她们坐下前还要接受一次点名。从那一刻起，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她们必须连续不断地以最快的速度接听一个又一个电话，不能休息。同时她们不能犯任何一个错误。接线员们进行的所有通话都会被中央投诉调查科的计算机系统细致的检查，她们所有的错误都会被记录下来。最终每个接线员都要面对自己的电子绩效单。她们的每个失误都会被视为是严重的错误。

最近，电话公司引进了一种新设备，它能够让一位接线员同等时间内接听六倍于之前的来电。几年之内这种机器将取代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接线员岗位。今天接线员们正被迫“自动”下岗，而电话公司仍在赚取巨额的利润！即便接线员们的工资是如此微薄，电话公司都宁愿不发这份工资。

接线员们的起薪是 2.5 美元一小时，除非她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她们的工资大概会是每周 50 美元左右。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妇女是与高薪岗位是绝缘的。通过强迫妇女从事最枯燥、低薪的工作，电话公司每年都能多收割到数千万美元的利润。同时他们成功地将男工人和女性工人分割开来。这种分裂为工人们团结起来扫除性别差异、改善工作环境的行动制造了障碍。

如果接线员们没有被置于如此严厉的监管之下，她们就不会照公司的计划行事，比如让她们“自行离职”。现在，当人们来电寻求帮助时，接线员们必须让他们拨打特定的号码并为他们提供指示。这只会激怒那些坚持要接线员提供帮助的人。这让接线员们的处境进退维谷——甚至比以前更甚，一整天坐着不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拨号指引，而不是像她们所受过的训练那样去接听电话。

接线员的工作环境是所有通信工人之中最糟糕的。她们刚刚上岗时就要面对不定的工作时长。有时她们要工作到午夜，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回来上班。即便是在工作几个月之后，直到周三那一下周的工作安排出来之前，她们也无法确定下周她们何时需要上班。

在上班期间，接线员们也不断地经受着骚扰。她们被要求“干快一点”、“不要讲闲话”、“坐凳子要从左侧上，离开要从右侧下”。此外，她们还被警告不要“惹人生气”。接线员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语气不好”或“服务态度不佳”而被开除。电话公司能够听到每一个接线员的声音，因为当接线员拿起电话时，它就会开始秘密地监听接线员的通话。有时，监工会发现某位接线员正在与另一位接线员闲聊，或者被无礼的客户激怒。她就会走到这位接线员身后并把她自己的耳机接入到设备中，然后后退一步并通过设备跟这个接线员说话，并责令她低下头看着设备。接线员被要求不能直视她的监工，也不能捍卫她的权益，因为这是“不服从命令”。

多数接线员就是这样被开除的，更多的则是主动离职。办公室里超过 200 名女性，每月都会有 24 人被换掉。黄色工会不会去维护那些工龄不满六个月的工人的权益。公司可以自由地用新人来换掉那些只工作了几个月的接线员。这样公司在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反抗之前，就能够斩断她们之间的联系。

表达不满的呼声

尽管人员的调动率如此之高，表达不满的呼声仍然持续地存在着，甚至时常表面化。在我工作的房间外面，在一张写有“工作区域内禁止饮食”规定的布告下面，有人写道：“我加入的不是军队”。而在房间里面人们会在那张代表着她们已经休息去了的卡片上面写“我想出去！”或者“救命！”。其他人看见后就会在下面给他们添加留言。例如，一张卡片上最初只画着一张正在尖叫的脸，一周后便有人在那张脸的下面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里有跳蚤”。又过了一周，就有人在下面加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里有跳蚤、老鼠、虱子、监工和主管”。呃，这倒是让电话公司方面挺紧张的，所以他们命令一个接线员把这些卡片上写着的字都涂掉了。这并没有阻止接线员们在卡片上写字，但是这些字也没有解决工作上的任何问题。

大多数接线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持消极态度。当我问起一位较为年长的妇女有关这些“跳蚤”的问题的时候，她承认她已经忍受这种叮咬很久了。但她接着说：“我来之前，这些跳蚤就已经在那里了，我走了以后它们也仍然会在那里”。这些跳蚤在旧的设备中繁衍生息，一旦遇上天气温暖的日子，它们就会爬出来吸接线员的血。

在一个天暖的日子里，我的一个朋友的每一个膝盖都被跳蚤叮咬了超过二十次。她向管理部门投诉了这件事情，但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于是我和她一起创作了一幅画着正在疯狂抓挠的接线员的漫画，上面还写着“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里的跳蚤”。我们把它贴满了整个工作的地方，并把漫画的副本和一封短信投给了一位报纸专栏作家。不久之后，他就在他的专栏中写道：“如果接线员微笑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刺耳，那就是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里的跳蚤……”就在那天晚上，电话公司就雇了一个灭虫员来消灭了所有的跳蚤。整个城市的接线员都惊呆了。接线员们的斗争情绪改变了，其中一些人对于能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其他问题感到更加乐观。在任何斗争中，争取那些可以赢得的事物是很重要的。

在这座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新雇接线员是刚结束学校生活的年轻人。她们中的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时髦的天堂，并最后来到电话公司，因为她们需要维持生计，而电话公司总是在招人。当她们进入工作岗位时，她们带着一种“这个国家是有问题的”的观念，虽然她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问题。几个月后，她们就会知道，电话公司和所有其它的公司一样，并不是为了使用电话的人或建造和维护电话的工人的利益而运营，它是为了少数公司高管和股东的利益而运营的。公司在提高工作速度、自动化、照明不足等方面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根本动力是追求更大利润。这些在里面

工作工作的人，包括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压迫和瓦解劳动人民，很快就对整个制度产生了深深的仇恨。

除了白人妇女，电话公司还雇佣了一些黑色和棕色人种的妇女，也有一些老年妇女。（持续地为电话公司工作的人非常少）这就在电话公司内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大的进步接线员团体，一个大的中立团体和一个小的反动集团。不同接线员对那些声称自己在电话亭里亏了钱的客户的态度，明显体现出了这种差异。进步者认同这种说法，中立者犹豫不决，而反动派则像护着自己的钱一样要护着这些“公司的财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团结和依靠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在电话公司内部这意味着我们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找到最进步的力量并把它们团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要我们倾听群众的心声，与他们一起工作，并找出他们在岗位上遇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通过与群众交谈，我们发现接线员们对“必须且只能引导顾客拨打指定号码”这条规定最为不满。因此，我和一个朋友制作了一个连环漫画，从公司以牺牲接线员的工作条件为代价增加利润开始，并展示了这对工作条件产生了什么影响，最后以接线员辞职告终。这幅漫画被印在了一份工人报纸的封底上。我们向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派发了这份报纸。大家纷纷把这幅漫画剪下保存。漫画是一种比长篇大论的传单更为贴近群众的宣传鼓动形式。

着装规范是另一项让人们恼火的事情。电话公司执意要接线员们着连衣裙上班，尽管她们极少在社会大众面前出现。就算是在寒冷的雨天也不允许穿裤子上班，这是极其荒谬的。所以一天早上有两位女人穿了裤子来上班。公司便把其中一人赶回了家并要求她换好衣服再来上班，并告诉另一个人她“真不像个女人，没人会愿意坐在你旁边”。但“反叛者”们还是接着穿裤子，其他人也陆续加入。三天后就有超过 25 人穿裤子来上班。公司的反应是发表了一份恐吓声明，声称 1 月 21 日之后穿裤子来上班的人都会被“处理”。我们用一份《人民的着装原则》进行了反击，声明自 1 月 21 日起每个人都应当穿他们想穿的衣服，只为保证温暖和舒适感。随着这个最后期限的临近，斗争越发激烈。它从一场自发的反抗演变成为了一次反抗公司专横制度的有组织的斗争。每个人都同意在 1 月 21 日之后继续穿裤子。即便公司到最后一刻都没有低头，他们也还是这么做。“每人都应保持着装整洁”变成了新的规定，即便穿裤子的人们还是受到了骚扰，也没有人被解雇。穿裤子的女性在食堂相遇时，还是继续说着“姐妹们的权利”，并跟其他人

谈论着争取更多的权利。在针对现实的利益与表达不满的斗争中取胜是反对失败主义的唯一途径。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保持开放心态的重要性

到此时我已经在这工作了十个月了。在我开始工作后不久就已经有另一位同志加入了我们，我们之间联系紧密。当时我们都在练习空手道，我们经常在休息时间一起练习、锻炼。其它的女性对此很有兴趣。她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喜欢在夜晚离开公司时的不安气氛，并且她们也希望能变得更加强健和独立，尽管在她们小的时候就被人教导要做个“小鸟依人”的女孩子——软弱且依赖他人。大家都亲切地叫我们“空手道小子”，她们中有少数人甚至加入了我们。

大家都对我们做过的事情感兴趣——从在街头打群架到骑摩托车，再到去山里搞背包旅行。大多数的女工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她们每天只是两点一线地往返于住处与工作地；这样的生活是很无聊的。因此，即便是那些不赞同激进学生的人也会饶有兴趣地听我们讲我们参与过的街头运动，并听我们解释它们背后的原因。从一开始我就公开了我的政治观点和参与过的学生运动。

有时人们甚至会问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我会说“是的”。在公司或者工会介入之前就亮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起初这些妇女们的反感很强烈，但随后她们的反应便缓和了，因为事实上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和她们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而且我也遇到了和她们相同的问题。始终和人民群众保持朋友般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政治组织者似的联系，这非常重要。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这一点，他对干部们说“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太多人格上的转变。在一开始，它意味着倾听群众的声音，开始了解贷款问题、抚养孩子和处理家庭关系的复杂问题，以及即使是生病也要坚持每天工作的纪律。一段时间后我对她们所做的事情有了一定了解，比如说烹饪，我也尝试着在她们有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帮小宝宝洗澡，散发耳机上用的耳垫，这对打破共产党人的那种“被洗脑了，总是偷偷摸摸行踪可疑，盲目执行着俄国人的命令”的刻板印象大有帮助。有一天我对一位老工人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她跳了起来，问：“正式党员？”（这里可能指那种“正式的”共产党？？？），我说不是的，我是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她看上去松了口气。她说“那太好了”。大多数知道我是共产党人的人们一开始都觉得我疯了，但后来她们都觉得我人挺好的。

但是，有些女性对我提出的这些想法很当回事儿。我不断地试图把她们对这份工作的憎恨同“电信公司是为了私人利益而运作的，而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这种理解联系起来。这起到了效果，她们认同了这种观点。随后的一步就是让她们同意不辞职并留下来做组织工作。区区几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只要我们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就能够改变这一切。

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坐下来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决定了要促成从争取带薪假期到争取停止窃听接线员通话再到争取子女免费托管等总共十项改变。我把这个计划在一次集体会议上做了报告，会上有一位同志建议我去阅读一下列宁同志在《怎么办》中写下的有关经济主义的危害的论述。会后我花了一整晚，把这些章节学习了三四遍。我曾经试着读过这些章节，但是我没能透彻的掌握它们。这是因为我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要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的实践，并使之走向更高水平。当我和我的朋友再次碰面时，我们一起为这个计划写成了一篇激进的反帝宣言，并在末尾加上了我们的四个要求——包括取消 10%的电话附加税和免除从电话亭拨打本地电话时的费用。

在《怎么办》中，列宁同志还提到，为了能够将反对国家机器的斗争持久地进行下去，共产党人不仅要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工会中工作，还应当从工人之中建立起广泛的支持。在这个国家里，这就意味着支持黑色和棕色人种的解放斗争，意味着支持殖民地的解放斗争，就像在越南那样。这也意味着反对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机器，反对帝国主义集团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它意味着联合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欧美和第三世界人民，将劳动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在电话公司内部，我们一小部分人通过成立一个激进的骨干团体开始了建设统一战线的进程。在我们中间，有男人和女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为个人而战的战士们变成了为所有人而战的战士。对妇女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在接线员之间组织起来反对她们作为妇女而受到的剥削，而且还意味着将所有的电话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反对所有被压迫者所受到的剥削。

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运用毛泽东的思想

我们的第一个计划是建立起对越南人民的支持。我们发布了一份传单，呼吁人们加入我们在十月进行的反战游行。我们还举行了一次会议，一位越南老兵为我们带来了幻灯片展示和一段说唱。有一部分新的人员加入了我们，我们和他们每周保持着一点联系。

我们一直都会参加工会的会议，并且在会议上提出问题。但是，除了在某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我们提出的一个帮助阿尔卡特拉斯岛上的印第安人并

为他们捐赠工会资金的提议，我们通常会被否决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工会并不希望我们将其转变为一个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了自己的计划。我们希望将所有的劳动人民都紧密团结起来，首先，我们开始为通用电气公司工人的罢工募集了资金和罐装食品，并参与组成了当地电器商店外的纠察线。

我们也尝试着在工人中间建立起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的支持，包括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当印第安人移居到阿尔卡特拉斯岛之后，我们在报上刊登了一份题为《谁拥有阿尔卡特拉斯岛？》的传单，在传单里我们试图展示美国骑兵是如何屠杀印第安人，并将他们驱逐出他们的土地的，就像今天帝国主义军队试图屠杀越南人一样。传单收到反应是好的，但不定期散发出来的孤立传单对工人没有太大影响。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它可以把问题都联系起来。

在巅峰期有三十名工人会来参加骨干会议。大多数人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遇到的，尽管也有人看到传单后找到了我们。我们希望所有的骨干都能够鼓励所有人来参与我们的会议并帮助我们完成计划。但最终这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吸收并整合新鲜血液变得困难，除非我们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下来去带领新人回顾我们团队的历史，并回答新人的问题。因此，确定我们统一的原则并加强骨干会议的组织变得非常必要了。为此我们设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它经常组织会议并总结经验教训。例如，当我们为印第安人收集食物和毛毯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公司的许可，可以在公司大楼内放置箱子，我们便这么做了。后来，我们发觉与公司合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从那时起，每当我们收集物资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大楼外面进行。

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围绕着要不要搅乱一场工会会议展开的，因为工会已经让那些在工作场所反对种族歧视的干事靠边站。一些骨干成员对这件事有其他的意见，所以我们对此进行了再一次的讨论，这次，我们强调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唯一能够知道一个决定是否正确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地去执行它，然后总结出它的效果。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破坏了工会的会议，而另一部分人却在会上提出倡议，我们将无法知道哪一种策略是不符合现实规律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提出倡议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排除在会议进程之外。所以我们决定破坏会议，这一次我们完成了目标。后来，我们总结了这次行动的效果，认定了这是正确的做法。

随后，人们开始问到哪才能看到关于“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论述。通过这种方式一些人开始认同毛泽东的指导并开始阅读毛著。

作为在核心内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我和另一位妇女不断地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想把城市里所有的接线员组织起来，我们想让所有其他的电话从业人员都支持她们。因此，考虑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原则，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应该彻底调查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针对我们在这个城市认识的所有接线员的调查汇总会议。在会议上，我们收集了许多关于接线员在工作中遇到了严重的骚扰和不公正的对待这一事实。后来我们把材料打印出来，广泛地分发给所有的电话从业人员。调查并揭露接线员面临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径，因为即使其他的电话从业人员的出境还不至于此，但他们都明白他们随时可能步接线员的后尘。接线员是电话从业人员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任何针对电话公司的斗争都必须以他们为基础。

有一次，我们的骨干小组在公司人事办公室围堵了一天，以抗议禁止妇女从事安装工作和其他专门由男性从事的工作的政策。在围绕妇女劳动者的实际需要组织这次示威活动时，我们赢得了来自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的几名妇女的支持。这个组织是由中产阶级妇女组成的，主要关心的是中产阶级妇女和上流社会妇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来自这个组织的姐妹们服从了核心会议的领导，甚至有两个男性与我们接触，他们想要在我们的示威活动的当天申请一份接线员的工作。最终公司并没有改变人事安排的方式，但这一行动确实改变了很多在电话公司工作的女性和男性，以及一些来自全国妇女组织的女性的想法，她们开始认识到将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这一举措的重要性。

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使湾区革命联盟的同志们能够像我们一样迅速地开展工作。在我们之间，批评的开展十分谨慎，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借此纠正我们的错误，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也向我们总结并汇报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尝试着避免他人犯过的错误并将自己的工作根植于他人的成功经验之上。我们所有的人都试着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建立起骨干会议，最终我们计划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组成一个全城工人委员会。鉴于附近城市同志的经验，我们尽量避免工会对我们工作采取狭隘的态度，并计划将这个组织扩大成为一个由劳动人民组成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来自第三世界的人民将发挥领导作用。

电话公司里的骨干团体中大概有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妇女。妇女在一开始是领导力量，但在骨干团体的建立过程中，团结男性和女性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斗争的基础都是阶级斗争。在这个国家里，妇女劳动者们被剥削，

为资本家提供了巨额利润，她们还遭受到整个社会的压迫。这一切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

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始终认为，我们在为电话公司中的妇女做的所有工作、争取妇女的解放与整个工人阶级的自由息息相关。妇女只有在工人推翻帝国主义的专政，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革命就是在一个真正代表妇女劳动者和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把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敌人的一切斗争结合起来。

3-7: 妇女解放同盟

面向工人阶级的妇女运动

1968年，“妇女解放”成为抗议运动的词汇之一。但因为“运动妇女”大多数并没有遭受到工人阶级妇女所知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妇女解放如果不和这个国家的妇女群众相联系，它就会有变成几乎没有解放的“解放”的危险。从旧金山湾区的伯克利到帕洛阿尔托，有许多小的妇女团体，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强调“妇女解放”中的“妇女”。

到1969年夏季，这些团体里的许多妇女站在反男性的立场，并谈论妇女的“姐妹情谊”，不考虑妇女的阶级差异（这和男性一样）。她们把“男性”看作是敌人，而不是现行的美国的制度和帝国主义，它把这些妇女所受的剥削压迫带入新的极端境地，妇女（以及男性）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则必须摧毁它们。

我们这些人提出这样的事实，在当时越南妇女遭到谋杀和强奸——好吧，这种强调被称为“在运动中像绵羊那样尾随着男性”。许多妇女曾经试图说服其他妇女，作为妇女我们应该从运动中撤退，形成完全独立的运动，“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与那些“呼吁我们加入的特定结构的斗争”的团体联系起来。

这些被认为是黑人、工人、以及第三世界人民的其他团体，没有认识到这些人民的半数——半数的黑人、半数的工人、半数的第三世界人民——是妇女。这些团体无法承担妇女从斗争中撤退的昂贵代价，直到她们准备好回来。妇女中的某个团体表示“我们认为联盟的这一天还很遥远”。

对于在自己享有的时间内可以做自己乐意去做的事情的妇女来说，她们还并不是必须要解决贫困、凝固汽油弹（战争）、和/或饥荒的那群人，她们的这种“妇女解放”成为一种倒退——“自由空间”这个措辞如此被使用着。

无产阶级妇女解放

要相信，真正的解放不是从自我放纵中产生的，想要妇女解放，对于贫困的、低收入的、有工作和无工作的妇女，各种团体中的妇女，包括海湾地区革命同盟、新闻报（译注：Newsreel，一个为活动家和教育工作者制作并分发有关社会问题影片的非营利机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其他各种集体，以及妇女解放团体来说，开始联合起来，去讨论我们可以做什么，是很有意义的。

兴趣是令人兴奋的。我们都认识到在湾区有许多妇女准备好去为实现真正的解放而奋斗。我们选择“妇女解放同盟”这个名字，是为了强调这点，即我们认为我们妇女是主要致力于所有人的解放斗争的——为解放的妇女。我们想阐明这点，即我们不把妇女解放和全面解放斗争分离，而是认为妇女的解放是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并且只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可能实现妇女解放。

我们想致力于组织非专业性工作女性、工人的妻子、失业妇女、依靠救济金生存的女性。并且我们也想建立对于其他“妇女解放”者的替代组织，以此女学生不会“退缩”，失去她们具有的斗争精神，或是被卷入女权主义，并用反革命的，而不是革命方式批评男性运动参与者。

每周举行会议，我们中的大约 25-30 人拟定了一个计划，包括：

- (1) 同工同薪，在雇佣、升职或工资标准上，禁止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 (2) 给所有孩子们建立免费的、24 小时的儿童保育中心；
- (3) 免费、全面的医疗服务，包括产科护理、节育和堕胎；
- (4) 第三世界人民的自决；
- (5) 结束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 (6) 对社会机构的控制，诸如警察局，政府等；
- (7) 免费、平等、有价值的教育，对所有人皆免费开放；
- (8) 分担家务；
- (9) 控制人际关系，包括所有已婚或未婚的男女，以及所有在婚姻中或婚姻之外出生的子女的平等权利；
- (10) 结束媒体对女性形象的贬低。

妇女解放同盟成立之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妇女中做了大量群众工作。这个计划任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类似组织的存在——即使没有群众基础——将继续鼓励其他女性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湾区越来越多的妇女正专注于工人阶级男女的需求，并且正从她们遮遮掩掩的小讨论团体中走出来，转入在职组织和社区工作。

罢工运动

在湾区的工厂罢工期间，妇女解放同盟积极地为工人的妻子们安排孩子照顾事宜，使得她们可以参加联盟会议等。我们设计了一个通讯系统和代码，用于通知该地区各种罢工场景中的动员情况。

妇女解放同盟举办了研讨会，讨论工作场所、学校、以及儿童保育中心的组织工作。在去年秋天举行的第一次研讨会上，我们中很少有人做过足够的群众工作来总结和批评。

最近一次，来自湾区六个不同地区的妇女参与了组织儿童保育中心的工作。

我们和其它组织的联系——和其他和我们具体同样目标的妇女们——使得这些成为可能，即妇女解放同盟所代表的不同群体中的妇女和任是其他团体中的妇女联合，并在国际妇女节，于旧金山教会区举行强调妇女解放中“解放”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来自黑豹党、民族七君子（译注：Los Siete de la Raza，指旧金山教会区七名年轻的拉美裔人。1969年，七人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名警察死亡。1970年，七人被无罪释放）、亚洲妇女联合会（United Asian Women）、湾区中学、旧金山医院罢工工人、新闻报和湾区革命同盟的妇女发表讲话，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

正是在这种指导下，妇女解放同盟能得到发展。很明显，组织不同群体的妇女朝着同一个方向工作是很重要的：通过围绕影响妇女的问题采取具体行动，以及通过参与全人类的解放斗争，组织工人阶级妇女对男性至上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进行斗争。

红色文件 3-8：黑豹党姐妹们谈妇女解放

（转载自《行动》报刊，1969年9月）

《行动》：黑豹党内的女性地位是如何变化的？黑豹党内的女性是如何应对党内的男性沙文主义的呢？

黑豹党妇女们：我入党只有十个月，而当我加入黑豹党的那一刻起，先前脑海中有关黑豹党人的认识全都被粉碎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自身的成长，我们才改变了先前对黑豹党的固有印象。然后，还有埃里卡·哈金斯，她经历过许多连一些兄弟们都未经历过的风浪，因此兄弟们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埃里卡。姐妹们都十分敬仰她，并且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姐妹们必须像兄弟们那样拿起枪；姐妹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社会。

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而且我们早已厌倦了坐在家裡并被（家务琐事）滥用，除非我们站起来，否则男性沙文主义仍然会展现出来，并成为了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事物。除非我们公开反对它，教导兄弟们什么是对的，并指出什么是错的，否则它就会一直存在。

过去在党内（男女的）角色分工是有区别的，因为姐妹们都曾被委以某种职责。这要归结于兄弟姐妹们的落后以及政治视角的缺失。像姐妹们总是自然就从事办公室工作，即文职工作，处理邮件列表之类的工作。你所知道的所有鸡毛蒜皮的工作，它们都自然而然地被推给姐妹们处理；由于姐妹们向来都是欣然接受，也因为她们曾经从事过类似的工作，这就是她们之前所承担的“责任”之一；因此，男性沙文主义便很容易地继续下去。我们所知的扛起重任的姐妹们的仅有例子可能就是凯瑟琳，或是其余一两个在党内其他工作领域行使职责的人。

在过去的4到5个月里，我们已经认识到姐妹们必须承担起更多责任，她们必须主动扩大自己的职责范围，而不应局限于那些女性通常做的事情，或是细节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已经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中：许多姐妹们拿起笔，撰写更多文章，姐妹们正在更多地关注党的政治方面，她们更多地在公共场合讲话演说；在社区里，我们甚至举办了广泛的外延活动，比如我们主动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兄弟姐妹们都在解放学校里工作。这一切都已经证明，地位并不会因为性别差异而降低，它取决于你的政治意识。

我始终记得，一年前当我刚入党时，大卫·希利亚德是全国司令部的领导，而党内还有另一位姐妹担任女同胞的全国领导；尽管大多数人都认同大卫·希利亚德，因其作为全国司令部的领导，但是大多数妇女同志都服从另一位队长的指示，因为她是女同胞们的全国领导。在她之下，还有女中士和女中尉，以及她们带领队伍里也都是女性。这样一来，兄弟们和姐妹们基本上是分开的。

当这一区分制度被废除，当兄弟和姐妹们不再分列任何单独的职位时，当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与特定职位的兄弟们或是姐妹们相处合作时，不仅仅是某些兄弟反应激烈，因为他们不喜欢必须与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姐妹们共事；部分姐妹们也显得不情愿，因为她们不得不与某些兄弟相处，或因为她们的级别低于那些兄弟们，所以就有人意图退出。所以，这一现象的成因，不仅要归结于兄弟们的男性沙文主义，他们不想与高于他们的，作为领导的姐妹们相处，也要考虑到姐妹们的表现，她们总是习惯性地想继续服从其他姐妹们的指令，而不是党内的领导者，无论男女。

我从入党以来，可以看到党在妇女领导和妇女解放的方向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埃里卡·哈金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变化并不仅限于埃里卡本人，或是仅就埃里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认识而言。而在于我们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水平都从我入党那时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及因为我们正朝着无产阶级革命前进，也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大男子主义及其所有的表现都是资产阶级的，而这也是我们要反对的事情之一。我们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解放妇女是重中之重；我们同时也认识到，革命的成功也取决于妇女。（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必须要解放妇女。）

《行动》：你之前提到过，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妇女的解放，那么可否请你解释一下这话的含义吗？

黑豹党妇女：那是因为，事实上妇女可以顶半边天嘛。一场革命的胜利不能简单地依靠男性的努力，因为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尽管她的作用被贬低为较小的，看似不重要的职位。

《行动》：你曾经说过越南妇女是你们的榜样。可否请你具体解释一下其对美国妇女斗争的意义吗？

黑豹党妇女：我们认为，关于妇女可以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越南妇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越南妇女们正与她们的男同胞并肩作战，抗击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她们能端起枪射击，视情况而定，也能背着孩子在外战斗，她们全心全意参加革命，与全体越南人民一样：男人们积极参加革命，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中。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妇女是否继续坚持斗争，也取决于男人们的坚持。因此，现在我们在越南看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激烈的斗争，女性实际上在其中扮演了另一半的角色——既非作用较弱的一半，也非较强的那一半，而是越南男性的另一半。我们以她们为榜样，我们希望美国的革命妇女也能够以此为榜样，实现她们所设定的目标。

目前，男性沙文主义的问题相当尖锐，也有些碍事。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每个人对此都很敏感，不过一旦女性在革命者的角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以越南女性为榜样，那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不再那么尖锐了。

我认为我们将要开始发挥作用，让妇女们很自然地表现得像个革命者，而不是像一个下属或者顺从的“另一半”。

黑人妇女的特殊角色

《行动》：黑人妇女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压迫的群体，既是黑人又有着妇女身份。这种特殊的压迫也赋予了她们特殊的，甚至是先锋的角色。你想谈谈这个问题吗？

黑豹党妇女：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上讲，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对于党内的妇女同志们而言，由于社会的局限，当我们提到我们想要获得所有应得的权利并承担全部应承担的责任时，这也多少是有些困难和敏感的。你也知道，我们的男性，某种程度上被（社会）阉割了。他们之前本应承担的职责被剥夺了——（社会）夺走了他们的男子气概。之前，我们不得不与此斗争。我们的男性经常会思索或者表达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承担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一个负更多责任的职位，那么这样反过来减少了他们承担的责任；这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以致我们必须确保（男女）角色是平均分配的。

这个话题十分敏感，也呈现了我们在与特定的对象，比如男性沙文主义，斗争时的一些问题，因为有些兄弟仍然担心妇女会支配整个政治舞台。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常见的论调，但我认为这却是真实存在的恐惧，我们必须足够敏锐来认识它；我们必须足够谨慎，以表明我们将在政治舞台上承担更多分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这些事情。

我认为在这场斗争的大背景之下，重要的是黑人男性要明白，他们的男子气概并不依赖于让黑人女性屈从自己，因为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灌输给黑人男性的东西，而这也是针对黑人妇女的特殊压迫的一部分。黑人妇女通常作为美国穷苦人民的一员，工人阶级的一员，遭到了更多的压迫；作为黑人，她们遭受了超级压迫，再加上女性的身份，她们则又受到一般男性以及黑人男性的性别压迫。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能看到在这个国家里，黑人妇女尤其受压迫。所以，对于黑人妇女以及黑人男性而言，充分理解所谓的男性气概并不取决于女性的屈从附属，而实际取决于他自己的力量以及他从革命关系中获得的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事实上，当女性顶起半边天而非继续扮演较弱的那一半时，革命关系将会更有成效。他们（男性）将和女性一样，从这种关系中收获更多。

《行动》：关于独立的妇女组织，关于妇女解放相对于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其他问题上的优先性，你对妇女解放的策略有什么看法？

黑豹党妇女：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把分散的妇女解放团体都归为同一个类别。它们的效果以及价值则取决于它们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个国家的革命目标。我认为，现在美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组织。有些人把男女性别矛盾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他们也就把这个矛盾（即使不公开说明，有人也已经将其付诸实践）变成了敌对矛盾，而这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男女性别矛盾是必须在革命力量内部解决的矛盾。它根本不能与阶级矛盾相提并论，阶级矛盾是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如果妇女组织不关注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那她们就不能真正地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向前进。因为，为了让妇女在这个国家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战胜男性沙文主义之前，必须经历数十年或许几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如果女同胞们不明白这一点，她们就无法真正战胜对她们的特殊压迫。

罗伯塔（Roberta）是正确的，而甚至对于那些确实致力于解决眼前斗争问题的妇女组织来说，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妇女解放组织的策略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正如罗伯塔所说，这些组织似乎把争取妇女解放视为当务之急，而事实上，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才是更紧迫的。妇女只有参与到那种男女平等，并且不论男女成员都为了共同目标戮力同心的现有组织中，才能真正获得解放，而不是仅仅只依靠妇女群体的努力。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斗争，妇女解放也不占特权，实际上它是整个斗争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女性沙文主义

任何一个以妇女解放为目标的组织，就像罗斯玛丽所说，都必须清醒地考虑到，它们无法独自存在也不能单独行动。它们也必须充分理解沙文主义一词的含义，沙文主义并不只是与男性挂钩。沙文主义是一种永久的，非理性，非理智的一个人对其自身性别的爱，如果一个妇女解放组织因为一位男性的到访就感到惶恐不安，这就是非理性和非理智的表现。不管是身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作为革命者，要单独发挥全部作用既不现实也不全面。如果她们不多加小心，便会走向极端，并且成为女性沙文主义者。她们对自己的性别有种永恒的爱，而且会完全否定革命斗争的意义。

不幸的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多加小心，那么妇女解放运动很可能被机会主义者所利用。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风尚乃至短暂的狂热，整个革命事业也会因此而倒退。这就是革命实践者们，由于我们所受的压迫，无法花时间去解决我们的

一些落后性而仅凭我们自己所可能导致的一种后果（译注：此处原文的因果关系颠倒）。就我所见，这将成为另一种分裂策略。

实践中的妇女解放

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分散的妇女团体当下所面临的危险，正因为它们是妇女团体，所以很有可能会偏离基本斗争的方向。然而，我认为在革命运动中，必须小心谨慎地使用谴责的形式。我认为，妇女团体的专门组织有其存在空间，这些团体可以做一些积极有益的事情：例如，在罐头厂和其他主要是妇女从业的特定工厂、电子产业和这类工业部门里进行工人阶级组织、组织合作托儿所来解放女性的时间精力。

不过，它们总是面临着某些危险，比如闭门造车的倾向，比如转变成为小资产阶级小团体的倾向，她们在那只是清谈自己如何不得不花费全部时间来照顾孩子，或者干脆把团体变成一个抱怨大会。所以我想，作为黑豹党，当我们把这些兄弟与姐妹之间的斗争融入党内的同时，我们仍会观察这些独立的妇女解放组织通过其实践将是如何运作的。这也是我们对它们的判断的来源。

我们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唯一值得保存的文化是革命文化。现在，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成为革命者。不管兄弟们说什么，就像罗斯玛丽所说的，我们的行动应站在促进革命以及革命文化发展的立场上。那些脱离男性的妇女解放团体（罗伯塔说它们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我们不能在其是否有存在空间这个问题上摇摆，我们必须根据其实践来判断它们），它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解放人民，也正如我们宣称的那样，这是一场社会主义的解放斗争，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要想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牢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把它们解放出来的力量集合起来，汇合成为男女之间牢不可破的解放力量——而不是沦为资产阶级的“邪教”，因为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它们沦为了极具女性优越感的极端组织，完全忘却了受压迫人民的苦难和人民的解放斗争，自己转而成为了压迫者。

妇女核心小组

《行动》：对于组织内存在的妇女核心小组，你是如何看待的？有人说，因为在组织内部有男性沙文主义存在，而妇女要从权力的角度来回应，所以她们应该组织属于自己的核心小组。她们还说，妇女解放和黑人解放之间也有相似之处，就如同黑人必须首先在没有白人的情况下团结在一起，而妇女也要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紧密团结。各种（妇女）运动组织一直都由男性主导，就如同民权组织在过去被白人主导一样。

黑豹党妇女：我不是很清楚，对我而言，这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因为在排除这个问题本身的情况下，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你不处理这些问题而选

择逃避的话，就永远无法从男性沙文主义的桎梏里解放出来。我觉得，如果带着那种想法建立任何单独的组织，都是在否定并与那些你要做的事相矛盾。我认为致力于妇女解放的任何类型的内部组织都要意识到，尽管妇女解放是很重要的，不过人民解放才是首要目标。如果她们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女性俱乐部，那么这样的俱乐部早已存在几个世纪了——那她们应该组建的是这样的组织，而不是自称为革命者。

除此之外，仅凭我们是黑豹党的成员，因而我们也是先锋队的一员，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认定自己是妇女解放的拥护者。我们坚信，男性沙文主义必须被革除，因为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正是资产阶级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也是我们要极力反对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近来才意识到这些事情，对此我们也并不十分熟悉。所以，我们是否会成为妇女解放的拥护者，以及我们能否为引领其他组织实现妇女解放而树立榜样，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来源于我们的实践。

《行动》：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运动未能吸引到很多女性的原因，要归咎于运动中存在的沙文主义，以及在很多政治组织中存在的胁迫现象。也就是说，因为男性主宰一切，所以我们无法吸引另一半的女性。而为了使更多的妇女加入斗争，妇女们必须聚集在一起讨论她们的特殊困难。

先进妇女所扮演的角色

黑豹党妇女：有些人认为“斗争并不能‘吸引’女性参加组织”，我认为这种观点出于主观意愿。因为，假如他们能够明白，这场斗争，不是女人或者男人的斗争，也不是为了“吸引”男性或者女性；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不论是否存在男性沙文主义，妇女们仍然会参加革命运动或入党，这是因为她们同意或者自愿支持现有的革命原则。如果她们发觉了男性沙文主义的存在，就应该愿意在革命原则和团结的基础上同它作斗争。还有，关于那句“他/她们并没有被吸引”——并没有广告宣传许诺摆脱压迫。（我们以为的）所谓“吸引”应该是建立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些主观愿望和想法。所以我要说，那些说不愿意参加斗争的女性，她们从一开始就不感兴趣，而不是因为没有被斗争所“吸引”。

《行动》：不，那些人说运动并没有解决她们受到的特殊压迫。

黑豹党妇女：好吧，这也许是真的；不过，还是如此，如果你对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感兴趣，你尽可以加入某个组织，把这个问题带在身上，而不是远离它。在组织内部，你可以在团结的前提下与之（男性沙文主义）战斗，而不是基于——“他们根本不是在解决妇女问题，也没有解决对妇女的特殊压迫，所以我才不会参加。”她/他们仍然是主观的。

好吧，我觉得那是一个妇女相对进步并且立场坚定的地方。事实上，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的客观条件，使得妇女更落后一些，是由于妇女们在家庭或学校里的地位，甚至是工作的妇女，即使其更易接触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她们仍然被迫局限于家庭、家务活以及孩子……她们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更受限制。所以，对于那些更加进步，也已经明白革命原则的妇女而言，更重要的是走进普通妇女群众中去，解释给她们革命的原则，并且与她们并肩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在政治上的落后性，我们必须与她们一起斗争。这是革命妇女可以发挥的特殊作用。

红色文件 3-9：越南的妇女

为了真正理解今天越南妇女的地位，稍微了解一下革命之前（约 1945 年前）的越南的妇女的生活是很重要的。百年以来越南都是被外国势力所统治的。自从约 1850 年以来法国控制了越南，越南的人民在法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十分之九的越南人是贫苦农民，在法国或是越南地主的土地上苟且。每当年成不好的时候，即使是拥有一小块稻田的农民也不得不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然后为这些地主的土地种植庄稼并支付巨额地租。

农民们也被迫缴纳各种赋税。为了缴纳税金，父母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儿女，丈夫被迫出租他的妻子。看到衣衫褴褛的农村妇女代替卖掉的水牛扛着犁耕田，是很常见的事情。妇女大约占据了劳动力的 15%。她们被迫一天工作 12 小时，做着和男性一样的活，却只得到男性一半的工资。女性工人在她们怀孕时会被毫不留情地被解雇。为了继续她们的工作，许多妇女试图通过束紧腰带的方式来掩盖怀孕，这往往会导致流产。因为传统思想，丧夫的妇女被禁止再嫁。夫家的亲戚会带走再嫁的寡妇的每个孩子。越南妇女不仅被法国和越南统治者压迫着，而且也被她们的丈夫所压迫。她们是奴隶中的奴隶。

然而，妇女的状况在 1930 年，随着印度支那共产党（译注：即后来的越南劳动党）的建立而开始快速改变了。这个由胡志明领导的党，认识到仅仅靠这个国家的半数人民——男性，参与到斗争中，是不可能从法国统治者手中解放自己，并赶走大地主与资本家的。党为了消灭一切压迫妇女和阻碍妇女参与革命的势力而斗争——在它的第一份政治著作中，党宣布了为性别平等而斗争是“革命的十大任务”之一。在 1930 年党帮助组建了妇女解放联盟（译注：即后来的越南妇女联盟），来动员女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首先是在对法国殖民者的战争中（1945-1954），其次是在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现在，则是在北越建设社会主义中。

越南妇女发起反抗，打碎长久以来束缚她们镣铐。许多时候她们因拒绝放弃自身解放的斗争而被折磨至死。一位妇女“Minh Kai”在共产党成立的早期被捕，拒绝给刽子手们任何供述。她遇害了。但是在她牺牲前，她在牢房的墙壁上用自已的鲜血写道：

“男人们！我——一位红颜女性
在这里与你们一起肩并肩斗争
我的肩上负着与大家相同的仇恨。

监狱是我的学校，团结起我的友人。

利剑是我的孩子，枪炮是我的丈夫！”（译注：出自《利剑是我的孩子》）这首诗明确地体现了越南妇女的精神——男女平等只能来源于他们的共同斗争，也就是为国家解放和建设新社会的斗争。

首先，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妇女们承担了家中所有的劳动来支持她们在前线战斗的丈夫，年轻的妻子们甚至会在他们丈夫的参军申请书上签名。截止到1952年，在北越和南越地区活跃着约一百万名为将法国殖民者驱逐出去而战的女性游击队员。年龄太大而无法参战的妇女则组建了“战士之母联盟”。这个组织的成员帮助藏匿士兵并给予补给。这些妇女将一切为越南解放而斗争的革命者都当作“自己收养的孩子”。

在北越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后不久，妇女们便为了重建祖国而不懈工作。比如为了建造一座水坝，妇女竟提供80%的劳动力。她们为消除美国与法国侵略者所造成的破坏而劳动。在法国统治下，河内有三万名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但是后来越南妇女联盟给这些妇女安排了生产建设小组，在那里她们可以通过学一门手艺而谋生。截止到1961年，女性工人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七万人（1952年为一万人）。与此同时，三百万农民妇女在农业合作社里劳动。截止到1965年，妇女占据了轻工业工人的45%和重工业工人的23%。

当然，北越妇女的解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曾经遇到了许多困难。那些从未离开家的妇女第一次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比如参加聚会等等），但许多当选职务的女性经常辞职，不是额外的工作太多造成了负担，就是她们的丈夫因为旧社会的落后思想而对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感到不满，他们只想要妇女照顾好家庭。党意识到了这些旧思想阻碍了妇女参加革命，因此除了设立保证男女平等的法律，党又发动了针对压制妇女的旧思想的持续的斗争。党把斗争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尤其是妇女自身。

在1946年，越南通过了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法律。这份法律保证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宣布了一个男性只能有一个妻子，并且保护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这在农民中引发了一场针对旧社会的落后思想习俗的巨大的斗争。像童养媳、一夫多妻等等之类的旧习依然十分普遍，仅仅靠法律并不能消灭这些陋习，党们通过大量批评教育和由妇女自己领导的持续的斗争才得以消除。

在今天的南越，即使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基于北方的胜利，妇女解放斗争也蓬勃发展着。越南妇女联盟将妇女组织为手工生产队

（比如做纺织、编篮子等等），来帮助她们过上独立的生活并同时增加她们的收入。在城镇里，幼儿园和育婴室也在每个季度里设立起来。

在越南新社会的任何时期，越南的妇女站起来了，获得了她们应有的地位，并作为平等的同志参与到斗争中，一起来改变世界。她们的斗争经验的确是值得我们从中认真学习的，作为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斗争的一部分，这对于我们女性反抗压迫的斗争的一种鼓舞。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妇女联盟不论过去还是当下都在十分关注妇女工农的日常需求，今天 90%的妇女都拥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基础教育和培训课程也为了女性工人而在工厂里开展着。

红色文件 3-10：苏维埃的女性——她们的胜利与短暂的失败

红色文献翻译按：马列毛主义者一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的颠覆是在 1956 年，而非文中提到的 1960 年代早期。

弗拉基米尔·列宁，首位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领导者，1917 年的苏维埃革命，一度说明着妇女的自由不能与工人阶级整体的自由相分离。对于俄国的工人而言，从大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手中夺取权力本应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能发动一场斗争，终结那些由资产阶级吸血鬼所组成的吃人社会及其强加于妇女的特殊奴隶制。若是没有那些被迫进入旧资产阶级社会却又被其压迫的百万妇女，革命本不应发生。如果不能继续推进斗争，从而使之前地位低下的妇女们得到解放，让苏维埃工人阶级继续控制这片土地、工厂、银行、乃至整个国家机器将会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列宁如是说。

苏联革命不仅仅从总体上终结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也使得制造业和其它行业向妇女们敞开了大门，并且终结了在工厂里将妇女们像动物一样驱使却仅仅支付远低于男性薪水的残暴旧习。

新的苏维埃宪法给予了妇女依照个人意愿结婚和在遭受虐待时离婚的权力，它也结束了那个在支付妇女极低薪水的同时也阻拦了妇女从事许多工作，特别是技术方面工作的陋习。

所以在 1926 年，自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仅仅还不到十年，就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是妇女，工会在处理这个特殊问题时依旧面临着妇女们：他们设立培训计划来提高妇女们的技术水平，生产负责人与组织者（从工人控制工厂，开始为自己生产产品而并非在鞭挞下为那些富有的老板们创造更多的利润后，工头便不复存在了）面对工厂里的工人及其家庭尤其是儿童的看护等等义务也随之扩大了。

这些措施被苏维埃工人政府热情的采用了。苏维埃的工人们遵循着共产主义理论创始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卡尔·马克思的教诲。恩格斯在俄国革命的四十多年前就指出“妇女的自由仅在她们能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等级上参与生产活动且传统家务活证明不了任何事且仅仅是她时间中无足轻重的一段时才有可能”。除了特殊的培训计划与专为女性工人所设立的儿童看护中心，苏维埃政府还设立了大量咖啡馆、服装供销中心、公共洗衣店和许多其它合作机构。种种的这类措施使得所有的劳动者，无论男女，开始有机会共同承担先前强迫女性在家中独自承担的工作。女性开始在社会每个角落与方方面面得到和男人一样公正平等的地位

制造业中的女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苏联女性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加入苏联军队，女性参与工作的范围大大拓宽——在工厂流水线上，在筑路队中、在交通运输线上到处都有女性的身影，不仅如此，女性甚至还可以成为医生、教师、经理、乃至规划者或是政治领袖。在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美国，女性在战争期间进入工厂，领着和以前一样低廉的工资，然后，当战争结束时她们又被赶回家中充当苦力。但在二战结束后的苏联，上千万的年轻男性在战争中牺牲，那些学会了新技能的女性甚至在继续朝着为完全自由而奋战的长征中赢得了新的地位和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机会。1945年，苏联女性工人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男性工人，在农业方面 60%的工作者是女性（并且也不全是简单弯腰的采摘者）；超过 80%的公共健康工作者是女性，甚至在大规模基建工作中，女性工人的数量只比总人数的一半稍微少点，这其中包括了技术工种。超过 60%的科学家和教师也是女性。

衰退的开始

但仅仅在约瑟夫斯大林逝世不到十年后，三十年来苏联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妇女们，以及整个工人阶级，开始崩塌了。尽管旧的统治者——地主、大工厂所有者、以及银行家，他们的权力已经被劳动人民解除了，然而依旧存在那些尝试以一切手段来重夺权力的顽固分子。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所铸造自私想法可不会轻易消亡，缓慢而坚定的，腐化老师、经理、甚至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组成了一小伙叛徒，他们利用了新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困难（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后，那时大多数铁路和工业已被摧毁且需要完全重建）以逐步蚕食的方式重新篡夺了权力。在 1960 年代早期，他们成功的颠覆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早的工人政府。代替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为幌子，他们将国家带回了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许多人工作，却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繁荣兴旺的社会。

这对于苏联工人阶级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失败。对于苏维埃的女性也是一场极其苦涩的背叛。

今日俄罗斯女性与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分享着一样难以忍受的处境。她们中的四分之三依旧需要独自完成所有的家务活，除此之外她们还有全职工作。的确，她们中的大多数是教师甚至是医生。但是这里的花招是这些职业伴随着社会发展已经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等级，与此同时男性已经转移到薪水更高，地位更虚伪的工作上——成为医学专家和其它领域的专家。

如今苏联女性的低下地位已被认为是“经济系统改革”的一部分，换言之，回归到资本主义的剥削系统——解雇、奖金。苏联于 1966 年通过的

“国营制造企业管理条例”中明确了工厂经理拥有占有，使用和处置工厂财物的自主权，出售“剩余”设备，原材料等等，为私人用途出租那些“暂时”不为公共生产使用的设备和企业厂房。另外，他们还可以确定和修改工人的工资和奖金，招募和解雇工人，并对他们施以惩罚。例如，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红十月钢铁工厂决定关闭它的两个车间并解雇了 730 名工人。为确保资产阶级的恢复和新统治阶级的发展，奖金被作为一种生产激励而发放，它们中的大多数流入了工厂经理的口袋。比如，利佩茨克工业工程机构经理一个月内获得了七次奖金，超过了一个普通工人两年所能挣得的工资。经理们的利润导向也导致了对于雇佣女性的歧视，因为害怕她们怀孕并需要长时间的休息。苏联当时的出版物反映了疥癣一样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是如何复辟的，各种出版物不断地推广“当一个人有了钱，就拥有了一切”之类的理念，并强调女子不如男与女性应该担任幕后角色等观念，从而达到苏联新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目的——工人阶级的分化（男性和女性之间）。他们通过刊登诸如此类的说法来强化这种观念：“然而母性和家庭在他们的血脉之中，没有这些他们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如果这样伟大的科学发现继续避开他，她会私语道：‘亲爱的你最后会成功的，那就是我所认为的女权！’”（注：刊载于《家庭与学校》）

因此在整个苏联的工人阶级中，无论男女，都被迫回归过去，成为了工资的奴隶。并由于现在的许多改革，像是托儿所、育婴室、公共餐厅以及更好的教育资源，苏联的女性不得不像男性一样被压榨。这些情况清楚的表明了“女性问题的本质就是阶级问题”。苏联女性的解放只有在整个工人阶级重获解放并彻底粉碎俄罗斯的新沙皇之后方可成功！

红色文件 3-11：中国妇女

1924年，国际妇女节，中国广东的一个公园，学生和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示威。他们高举“打倒帝国主义！”“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同工同酬！”和“平等教育！”等口号。

这些学生和工人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慢慢蚕食中国的领土，推行他们的统治来奴役中国人民。与此同时，许多进步人士正在同中国的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斗争，这些资本家和地主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并与帝国主义者合作，出卖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还与许多古老的传统作斗争，这些传统阻碍着人们击败压迫者。

其中，妇女受到这些古老传统的束缚尤为严重：被强奸的妇女可能会自杀；丈夫去世的妇女再婚后将失去子女；当妇女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便把他们的女儿作为“妻子”卖掉，而这些年轻的“妻子”实际上是她们丈夫父母家里的无薪奴隶；卖淫盛行，尤其是在像上海这样由英美日帝国主义者经营的“条约港口”城市。1919年，反抗帝国主义、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生们竖起“打倒吃人的封建残余！”的旗帜，其中就包括极其压抑的婚姻传统。

当然，今天中国的妇女状况大不相同：妇女在包括婚姻在内的一切法律关系中与男子完全平等；她们参与并领导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

这一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资本家和地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妇女同其他穷人和劳动人民一起得到了解放。中国妇女在争取自己的解放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击男性沙文主义

在这一点上，究其原因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之初就组织和发展了妇女战士和领导人，并在自己的队伍和人民中的男性沙文主义作斗争。

1924年，中共中央就妇女运动作了如下声明：

1. 妇女党务工作重点在于开展群众性活动；
2. 女工是运动的骨干，但学生在维护党群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打破家族主义（具有专制主义的中国家庭）思想习惯中起着重要作用；

3. 农民妇女很重要，必须接受妇女运动的培训；

4. 妇女出版物必须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可以讲述妇女亲身经历的苦难和实际需要；

5. 增加妇女运动中的妇女党员和领导人。

当党员们按照这个决议行动的时候，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产生了领头的女战士，比如被称为“革命老妈妈”的施小妹。她 1889 年出生，12 岁时在上海一家由外国资本家经营的纺织厂工作。在她 33 岁的时候，她带领她的同事成功地对剥削者发动了罢工。1927 年，也就是日本侵略上海、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那一年，施小妹与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斗争。她把枪偷运给前线的同志，其中就包括她的长子，此人在后来的运动中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杀害。他是她三个儿子中在争取解放斗争中被杀的第一个。

蒋介石反动派追捕“革命老妈妈”，但未能抓到她。她躲开了追捕，并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 1964 年，她居住在上海的一间小房子里，并作为一名资深的上海工人进行演讲。

妇女同地主的斗争

在整个农村，红军从日蒋反动派解放出来的地区，数以千计的妇女参加了与地主的斗争。地主被带到人民面前“清账”，全村都指责地主打、饿、抢、杀农民。村里的妇女经常遭受地主最残酷的虐待。但在最开始的时候，许多妇女害怕参加会议，因为如果她们离开家，丈夫会打她们。

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妇女联合会，使“中国的半边天”参与到对地主和日本人的战争中。例如，在 1948 年的一个解放区，在张庄，一个男人向妇女联合会解释说，他在妻子去开会时打了她，因为他认为女人离开家只是为了见其他男人。妇女们气炸了，她们从四面八方冲过来，踢，打，尖叫，“你会打她吗？你会打她，然后又诽谤我们吗？如果是的话，让我们来教教你。”

“站住！我再也不会打她了，”惊慌失措的丈夫喘着气说。

这些妇女联合会为争取妇女平等而斗争，努力动员妇女参加全面斗争。其中一个解放区的观察员写道：“没有社会的成功转型，没有土地改革的完成，没有解放区对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攻击的胜利防御，就不可能谈论妇女的解放。许多妇女是凭直觉认识到这一点的，她们使妇女联合会成为全面动员革命背后妇女力量的工具。她们所有的活动都与争取平等的

斗争紧密相连，妇女要求她们自己不再被当作私人财产来对待。如果这一要求惊动了男人们，那么妇女们就会用对所有革命目标的全力支持来堵上了男人们的嘴，并因此赢得了他们勉为其难的钦佩。因为在他们心中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半边天’们的帮助，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胜的。”

1949年中国大陆全面解放，妇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新的婚姻法废除了童养媳、出卖女儿结婚、干涉再婚等内容。当夫妻双方都要求离婚时，如果儿童能“得到照顾”，离婚便立即生效。这部婚姻法花了17个月的时间起草，并基于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与对9亿解放区人民的经验的总结而得出。

通过的法律，保证了妇女可以与男子平等地接受雇佣和培训，同工同酬。在全国范围的扫盲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文盲妇女（和男性）学会了阅读。政府、工厂、社区和公社发展了数以十万计的儿童保育中心，使许多妇女可以从事生产劳动。妇女开始在工业、政府和文化的各个部门发挥积极和领导作用。到1955年，14.5%的军官是女性。

宣传杰出和英勇的妇女的例子，例如妇女在家庭、村庄和工厂中与男性霸权作斗争的例子，目的在于鼓励妇女去维护她们的权利，并鼓励男人改变对待他们的方式。妇女的卖淫和其他性剥削很快就被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以及对前妓女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所终结。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是为数不多的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之一，她写道：“她们的丈夫之所以远离她们，是因为她们要做家务，但现在她们在一起学习和参加会议上获得了新的友谊……很多女人过去在知识和发展方面跟不上丈夫，因此失去了联系，但现在她们既可以自由学习，也可以自由工作，这些都让人感觉到她们的渴望。”

1953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反对旧的封建思想，此时旧的封建思想仍在阻碍妇女的发展，阻碍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发展。政府意识到，要想摆脱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男女关系的旧观念，需要长期而集中的努力。

文化革命

当然，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很多斗争的胜利依旧亟待实现。地主和资本家试图重新掌权。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矿山和工厂中，在码头和农场上，数亿中国工人团结起来，推翻旧统治者和他们的前辈，保卫他

们的工人国家，巩固他们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种与旧统治者的斗争被称为 GPCR。从 1966 年到 1969 年，激烈的斗争持续了三年，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学校、军队、工厂、报纸、文化中心和集体农场的改造仍在继续。

在每一场主要的战斗中，妇女都站在与旧奴隶主斗争的最前线。GPCR 的第一幅“大字报”（一幅批评中国社会某些方面的大字报）是一位妇女写的。从 HWB 到革命委员会，妇女在一切为进行 GPCR 而成立的组织中都有领导权，妇女被选为工厂、公社、学校、部委和其他社会机构的领导人。1969 年，当新的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总结和巩固这场斗争时，不仅有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而且有更多的妇女作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出现在那里。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的斗争，同中国劳动人民的整体解放一道，正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一次又一次地推倒障碍。

在今天的中国，国际妇女节是所有妇女的节日。人们通常通过聚会、节目、讨论妇女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有待进行的斗争来庆祝。特别是在国际妇女节上，她们表达了对全世界受压迫妇女的团结和支持，鼓舞了人们对胜利的勇气和信心。